

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两种演化路径

——基于春秋体系和二战后体系的比较研究*

杨 原

内容提要：文章研究了两个相关联的问题：第一，同样处于无政府状态，为什么在春秋初期和二战后初期的国际体系都出现了明显的大国主动利他的行为？第二，为什么二战后初期出现的利他行为得以延续并被逐渐巩固，而春秋初期出现的利他行为却未能延续，反而逐渐退化为一个彻底的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文章通过理论模型和案例比较显示，在特定条件下，即使处于无政府状态，追求权力的大国也会主动采取具有利他效应的利益交换战略。导致这种权力竞争方式出现的最关键的条件是体系中存在抑制大国剥夺小国自主性的社会规范。不过，受具体体系环境的约束，即使所有条件都满足并且使得利益交换战略成为大国权力竞争的占优战略，并不意味着这种良性的权力竞争局面一定能够持续下去。当大国对小国施加武力胁迫的成本越小，而武力胁迫战略给竞争对手带来的收益越大时，以利益交换为主流权力竞争战略的良性竞争模式就越有可能被以武力胁迫为主流权力竞争战略的恶性竞争模式所取代。

关键词：春秋体系 二战后体系 利益交换 权力竞争 演化稳定战略

作者简介：杨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受版面限制，本文发表时有所删节。感谢陈拯、蒲晓宇、漆海霞、孙学峰、周方银等学者及《当代亚太》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文责自负。

《当代亚太》2014年第5期，第4~50页。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Bimonthly)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在二战后初期和中国古代春秋初期（以下简称春秋时期），都能观察到大国通过利益交换（主要体现为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这种相对和平的方式获取和竞争权力。这种权力竞争方式在二战后得以保持并一直延续至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得以加强，使得大国越来越不可能通过军事征服和武力兼并的方式争夺霸权。^① 与之相反，这种竞争方式在春秋时期却未能得到延续，随着时间的推移，春秋大国逐渐放弃了利益交换，转而采取武力争夺和兼并小国的方式竞争。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二战后体系和春秋体系的进程出现了如此大的差异？考虑到二战后体系存续的时间相较于春秋体系还很短，那么，二战后体系在未来重复春秋体系悲剧性进程的可能性有多大？

（一）现象描述

春秋时期的国际体系与二战后的国际体系有许多显著的相似之处。^② 在体系性质层面，两个体系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又都具有一定的等级性特征。^③ 在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两个体系都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春秋体系中既有以周礼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和中原文化，也有以楚国为代表的蛮夷文化。二战后的国际体系则长期存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在制度层面，两个体系都存在作为国际合法性来源的国际行

^① 关于二战后大国权力获取方式变化的初步探讨，参见杨原：《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第96~116页。

^② 对此的详细比较参见叶自成：《中国崛起——华夏体系500年的大历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13页。对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体系与1648年以来近现代国际体系可类比性的论述，参见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3-7; 陈玉聃：《国际关系学中的经典与阐释》，载《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3期，第107页；杨倩如：《对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思考》，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第141页；杨倩如：《先秦国际体系的类型与演变》，载《国际政治科学》2010年第1期，第97页；吴征宇：《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与现代国际关系研究》，载《当代亚太》2008年第6期，第137页；胡波：《古代东亚国际关系体系的肇始》，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59页。

^③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4~34页。

□ 当代亚太

为体，即春秋体系中的周王室和二战后体系中的联合国。^①

在诸多的相似性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两个体系初期，都出现了大国的利他行为，即大国主动帮助其他国家，维护或扩大其他国家的利益；并且这种行为还是这两个体系初期大国获得地区主导权的主要原因。二战后的历史为国际关系学者所熟悉：二战后初期，美国出台“马歇尔计划”等经济援助政策，为西欧和日本等地区（国家）战后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大量经济和技术援助；同时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军事联盟，在面对苏联威胁的背景下为其盟友提供安全保障。苏联也通过“莫洛托夫计划”和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等措施为东欧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同时通过组建华沙条约组织等军事联盟为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和安全保障。

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春秋体系初期，同样也能观察到大量的大国利他行为。早在齐桓公称霸以前，郑庄公小霸时期的郑国就曾于公元前 706 年派兵援助齐国，帮助其击败了入侵齐国的北戎军队。^② 而齐桓公更是凭借“尊王”和“攘夷”战略，通过为周王室和小国提供政治和安全保障，成功获得了体系霸权的地位。^③ 公元前 662 年，齐国为救援燕国出兵北伐山戎，击退山戎后还主动将齐国的部分土地赠予燕国。^④ 公元前 661 年和 659 年，齐国两次为救援邢国抗击狄兵，并将邢国迁到夷仪安置。^⑤ 公元前 660 年至 658 年，齐国又帮助因狄人入侵而灭国的卫国复国。^⑥

相比直接的掠夺和武力征服，通过利他性战略谋求影响力和权力地位，

① 叶自成：《中国崛起——华夏体系 500 年的大历史》，第 12 页；董青岭：《复合建构主义——进化冲突与进化合作》，时事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55 页。

② 《左传·鲁桓公六年》。

③ 有关春秋时期大国“尊王攘夷”的史实和分析，参见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第 4~34 页；徐进：《春秋时期“尊王攘夷”战略的效用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2 年第 2 期，第 38~61 页。也可参见本文第四部分。

④ 《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⑤ 《左传·鲁闵公元年》；《左传·鲁僖公元年》。

⑥ 《左传·鲁闵公二年》；《左传·鲁僖公二年》。

无疑是一种更为温和且具有正外部性的大国互动方式。^①然而，春秋和二战后体系随后的进程，在大国权力竞争的维度上却逐渐出现了分异。对于这种体系性变化，我们可以从国家消亡数和战争次数两个方面来观察。在国家消亡方面，坦妮萨·法扎尔（Tanisha M. Fazal）的统计分析表明，在 99.5% 的显著性水平上，相较于 1945 年以前，1945 年之后国家避免因暴力方式消亡的可能性不低于 92%，这一时期对一国的征服和占领事实上已经停止。^②唐世平对 1450~1995 年欧洲国家数量的统计也显示，在 1945 年以前，这一地区国家的数量一直呈下降趋势，然而在 1945 年以后，这一地区的国家数量不减反增。^③

在战争次数方面，统计显示，1495~1945 年间，一年中一国卷入战争的概率最低为 1/67，而在 1945~1990 年间则为 1/167，1991~2003 年则为 1/250。换言之，1945 年至今，每个国家每年不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不低于 99.4%。^④另一项统计数据显示，1816~1945 年国家间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概率为 29.6%，而 1946~1992 年这一概率仅为 8.9%。大国间战争的概率更是由 1945 年以前的 34.6% 骤降为 1945 年以后的 7.7%。^⑤正因如此，1945 年以后的时代被认为是近代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期，大规模国际战争已经几近消亡。^⑥因此有学者提出，冷战时期与 1816~1945 年的国际体系存在根本

① 如果存在权力竞争的大国都通过利他行为谋求其权力的扩大，这种互动方式就类似于“价格战博弈”。在市场竞争中，两个企业为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都竞相压低自己商品的价格。这种竞争对于企业来说是一种恶性竞争，但却给消费者带来了福利，使得消费者可以更低的价格购买到这种商品。在二战后的国际政治中，“价格战博弈”的正外部性体现在，美苏两国为争夺霸权，都不得不为各自的盟友乃至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其盟友以及其拉拢的第三世界对象国可以从美苏竞争中获取经济、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好处。

② Tanisha M. Fazal, *State Death: The Politics and Geography of Conquest, Occupation, and Annex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80-85; Tanisha M. Fazal, “State Death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 2, 2004, pp. 311-344, 328-329.

③ Shiping Ta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6, No. 1, 2010, p. 39.

④ Kalevi J. Holsti, “The Decline of Interstate War: Pondering Systemic Explanations”, in Raimo Vayrynen, ed., *The Waning of Major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35-136.

⑤ Marie T. Henehan and John Vasquez, “The Changing Probability of Interstate War, 1986-1992”, in Raimo Vayrynen, ed., *The Waning of Major War*, p. 288.

⑥ Richard Ned Lebow, *Why Nations Fight: Past and Future Motives for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3-4; John Mueller, “War Has Almost Ceased to Exis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4, No. 2, 2009, p. 301.

□ 当代亚太

性的差异 (fundamentally different)。^① 总体来说, 1945 年以后, 尽管国际冲突甚至局部战争仍有发生, 但二战结束后所确立的以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核心的体系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维持和遵守,^② 而且大国间的和平互动方式正在向更加制度化的方向演化。^③

反观春秋体系, 在国家消亡数量方面, 春秋初年, 西周分封的邦国有 140 多个, 而到了春秋后期, 尚存的周朝诸侯国仅剩十余个。^④ 从战争频率看, 春秋前期的前 50 年, 大小战争仅七、八次, 前期后 40 年约七、八十次; 中期约 134 年, 约五百多次; 后期约 93 年, 约二百五十多次。^⑤ 不仅如此, 从春秋到战国, 战争的规模和破坏性也呈明显的加剧趋势。春秋时期 (尤其是前、中期) 的战争大都不具备摧毁性。而到战国时期, 战争则逐渐演变为彻底的全民战争, 战争的歼灭性和残酷性变得异常突出。^⑥ 在战争的具体实施方式上, 春秋前、中期的战争依然受到周礼的制约, 具有明显的温和色彩, 而到春秋晚期以后, 战争则越来越趋向残酷和诡诈。^⑦ 总之, 春秋前、中期更多保留了西周的时代特征, 而到晚期则已显现出战国社会的特色。^⑧ 尽管在其初期曾出现过较为良性的大国互动模式, 却并未能维持和延续, 反而逐渐滑向了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恐怖而血腥的互动模式。

(二) 对研究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由此, 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细化为两个方面:

① Paul D. Senese and John A. Vasquez, *The Steps to War: An Empirical Stud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56-257.

② Sharon Korman, *The Right of Conquest: The Acquisition of Territory by Force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especially Chap. 7.

③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ap. 4; Robert Jervis,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Will It Resemble the Pa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 3, 1991/1992, pp. 39-78; Randall L. Schweller, "Rational Theory for a Bygone Era", *Security Studies*, Vol. 20, No. 3, 2011, pp. 460-468.

④ 高锐:《中国上古军事史》, 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21、372 页。

⑤ 春秋时期可以大致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前期从周平王东迁 (公元前 770 年) 到齐桓公始霸前一年 (公元前 680 年), 中期从齐桓公始霸 (公元前 679 年) 到向戌弭兵之会 (公元前 546 年), 后期从向戌弭兵之会 (公元前 546 年) 到晋国赵、魏、韩三家分晋 (公元前 453 年)。时期划分及战争数据参见高锐:《中国上古军事史》, 第 124 页。

⑥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家国家的诞生》, 夏江旗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第 6、18、50、102~103 页; 高锐:《中国上古军事史》, 第 374 页。

⑦ 黄朴民:《梦残干戈——春秋军事历史研究》, 岳麓书社 2013 年版, 第 12 页。

⑧ 同上, 第 3 页。

问题 1. 春秋初期和二战后初期的国际体系都处于无政府状态，但为什么在这两个无政府体系中，都出现了明显的利他行为？

问题 2. 为什么二战后初期出现的这种利他行为得以延续并被逐渐巩固，而春秋初期出现的利他行为却未能延续，反而逐渐退化为一个彻底的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

对于第一个问题，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家一切战略的核心任务是自助 (self-help)，帮助他国或者等待他国的帮助都是危险的。^① 正因如此，现实主义者反对经济和军事上的相互依赖，强调相对收益的重要性，认为理性的国家不应将自身的安全和福祉寄托在与他国的合作上。^② 但二战后体系和春秋体系初期的大国行为显然与现实主义的这个核心主张不符，恰恰相反，这两个体系初期的大国都是有意识地采取有利于小国的行为，而其（地区）主导权的获得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种利他式的行为。

这种利他式的行为，其内在逻辑在本质上与市场中企业获利的逻辑一样，都是一种利益交换，即通过为其他行为体提供满足其需求的物品或服务，以换取回报。^③ 然而，对于那些深陷自助逻辑的现实主义“原教旨主义者”来说，“自私”的国家为他国提供好处以迎合他国需求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例如，摩根索 (Hans Morgenthau) 就曾认为，“在引入现代对外政策实践中的各种表面的和真正的创新中，无论是对于理解还是对于行动而言，没有什么比对外援助更令人困惑的了”。^④ 又如，面对二战后美国的利他行为，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曾惊讶地表示，“任何老牌强国都会努力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保持其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然而美国却曾

① 有学者认为，国家行为究竟是自助还是他助，是现实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关键区别。参见 Paul W. Schroeder, “Why Realism Does Not Work Well for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Upper Saddle River, N. J.: Prentice Hall, 2003, p. 122.

②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Chap. 6, 7, 8.

③ 关于利益交换逻辑的详细阐释，参见杨原：《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大国无战争时代大国提高国际影响力的核心路径》，第 106~111 页；杨原：《大国无战争时代霸权国与崛起国权力竞争的主要机制》，载《当代亚太》2011 年第 6 期，第 16~20 页。

④ Hans Morgenthau, “A Political Theory of Foreign Ai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56, No. 2, 1962, p. 301, 转引自丁韶彬：《大国对外援助——社会交换论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3 页。

□ 当代亚太

着手帮助过那些曾经被它打败的对手使其重新站立起来……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①

问题在于，如果这种利益交换式的权力获取方式如现实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国际政治的一种极特殊的例外，又该如何解释春秋初期及二战后至今大国以利益交换方式谋求权力地位的现象？这些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如果利益交换并非一种例外，而是某种条件下国际政治的一种必然状态，那么以自助为“硬核”之一的（新）现实主义研究纲领就将面临挑战。^②

对于第二个问题，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彼此间有可能出现安全困境。当陷入安全困境时，彼此的恐惧会导致军事对抗的升级，甚至引发预防性战争或先发制人式战争。^③换言之，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处于安全困境的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乃至战争的概率要高于未处于安全困境的国家之间。在春秋体系的初始阶段，各诸侯国领地均为周王室所封，各国之间从未经历过大规模战争，大国基本不会对自

^① Fareed Zakaria, “A Conversation with Lee Kuan Yew”,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2, 1994, pp. 124-125, quoted from 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p. 234.

^② 现实主义学者查尔斯·格拉泽曾经指出，在结构现实主义的框架内，自助也可以以合作的形式来实现。但他所谓的合作是指国家为避免军备竞赛而采取协调性的政策，与这里所说的基于利益交换逻辑的自助不同。参见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1994/1995, pp. 50-90。相比之下，另一位现实主义学者施维勒指出，意图改变现状的小国会为了得到大国许诺的回报而追随大国，这倒更接近这里所说的利益交换逻辑下的利他行为。但这一观点实际上已经背离了新现实主义研究纲领关于国家自助假定的内核。参见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72-107。

^③ Charles L. Glas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4, 1992, p. 499;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1996, p. 117; Charles L. Glaser,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50, No. 1, 1997, p. 171; Robert Jervis,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Deb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1999, p. 49; Dale C. Copeland, *The Origins of Major War*,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2; Jeffrey W.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2000-2001, pp. 147-150; Andrew Kydd, *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50.

身的生存安全有强烈的担忧，当时的大国间几乎不存在安全困境。^①然而在二战刚结束时，由于刚刚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分歧，美、苏等主要国家对自身的军事安全有着强烈的不安全感，安全困境状态非常严重。^②从这个角度看，二战后的大国应当更容易、更有可能陷入彼此征伐、武力争夺的状态，而春秋时期的大国则更有可能保持原先那种相对和平的互动状态。但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其原因何在？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将春秋和二战后初期的那种非摧毁式的大国竞争状态近似地视为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所说的洛克文化，那么很显然，春秋初期的洛克文化最终演变为了战国时期的霍布斯文化，而二战后的洛克文化则一直得以保持，甚至在某些地区（如欧洲）还存在向康德文化演变的趋势。^③以反对现实主义静态体系观著称的建构主义虽然承认并试图解释体系的变迁，但其所说的体系变迁是一种“进步式的”（progressivist）。温特的结构建构主义理论明确排除了文化倒退的可能性：“一旦洛克文化得以内化，就很难再退回到霍布斯文化之中。康德文化之于洛克文化也是一样。”^④此后，温特更加明确地宣称，国际体系通过这种线性演化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发展为世界国家（world state）。^⑤

如果建构主义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即洛克文化出现后只有可能进化为康德文化而不可能退化为霍布斯文化，那么又该如何解释春秋体系所经历的由相对和平状态到彻底战争状态的过程呢？如果由洛克文化向霍布斯文化的

① 事实上，直到春秋后期吴楚争锋的时代，大国之间依然未出现明显的安全困境现象。公元前548年，楚、吴两国两次交战，楚国均大胜，第二次甚至直接将吴王诸樊射死。然而就在同一年，晋国的属国郑国两次派兵攻入楚国的属国陈国，楚国都没有做出救援的反应。同一年，晋国与楚国的另一个重要盟国秦国议和，楚国也没有做出明显的反应。参见《左传·鲁襄公二十五年》。

② Robert Jervis, “Was the Cold War a Security Dilemma?”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3, No. 1, 2001, pp. 36-60; Shiping Tang, “Appendix I: World War I and the Cold War Revisited”, in Shi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y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185-187.

③ Robert Jervis,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pp. 39-78. 对出现这种趋势的一个典型的错误预测参见 John J.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5, No. 4, 1990, pp. 5-56; John J. Mearsheimer, “Why We Will Soon Miss The Cold War?”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266, No. 2, 1990, pp. 35-50.

④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6页。

⑤ Alexander Wendt, “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9, No. 4, 2003, pp. 491-542.

“退化”并非一种例外，而是某种条件下国际政治的一种自然趋势，那么建构主义的线性演化观和历史进步主义观就将面临挑战。

综上，现实主义强调国家行为的自助性，同时强调国际政治的本质“亘古不变”。^① 而建构主义虽然承认国际体系的变化，却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这种变化只会进步而不会退步。本文所提出的问题 1 和问题 2，分别对这两个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宏理论的核心假定或命题提出了挑战。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更新和发展，更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国际体系演化的内在机理和大国政治行为可能的运行轨迹。

二、文献回顾

（一）对问题 1 的解释

谈到国家的利他行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最常见的解释是温特提出的康德文化。在这种体系文化中，国家之间不再会相互消灭或相互竞争，而是将彼此视为“朋友”，当一个国家的安全受到第三方威胁时，即使帮助这个国家不会有任何直接或即时的回报，其他国家也会提出帮助。^② 温特尝试给出了从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进化的机制，其中最核心的是，国家可以通过长期不断地服从规范，或者展示其国内政治中的自我约束制度，或者通过单方面的自我牺牲，让其他国家产生“这个国家是自我约束的”这种信念。这种信念有助于催生“亲社会”行为，从而使得国家即使在没有私利可图的情况下也会“关心”其他国家。^③

然而，这种“朋友”身份建构理论未能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国家为什么要采取努力让其他国家相信其是自我约束的？难道只是出于塑造康德文化这个“伟大”的愿望？建构主义认为，在康德文化形成之前的洛克文化中，国家行为的核心逻辑是竞争。而在一个充满竞争的体系中，若一个国家长时间进行自我约束和自我牺牲，不仅会使其在激烈的竞争中丧失直接的利益，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66;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7;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2.

②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 370~376 页。

③ 同上，第 423~455 页。

而且会对其他国家释放“我是软弱的，我是偏好妥协的”这样一种信号，这种国家形象的塑造更会使其在较长时间内失去竞争优势。在温特的理论中，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机制，能够使得浸泡在洛克文化中的国家追求“朋友”这种集体身份的欲望超过其在竞争中获胜的欲望。总之，温特并没有为康德文化的出现提供真正的解释。^①

在建构主义看来，帮助他国和利己动机是矛盾和抵触的。^②但如果我们跳出（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非此即彼的思维窠臼，就会发现利他行为完全可以在理性主义的框架内找到解释。大卫·莱克（David A. Lake）1999年提出的关系性契约理论（theory of relational contracting）就是一个典型的完全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解释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理论。莱克指出，二战后科技的进步（如核武器和导弹技术的出现）为美国及其盟友集中利用军事资源提供了便利，并提高了美国与盟友安全合作的正外部性，而且盟友之间还能在安全领域实现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友间巨大的实力差距使得盟友背叛美国的可能性很小。在成本—收益对比的考虑下，美国在1945年以后从根本上调整了此前的孤立主义战略，转而选择利用联盟构建安全，并为此积极承担联盟责任。^③

这种理性主义的解释依然是从安全的角度看待美国二战后的对外行为，即美国之所以会选择利他式的行为是为了扩大自身的安全。但问题是，对于那些成员实力不对称的联盟来说，联盟成员的安全和决策自主性之间是存在张力的，联盟成员往往需要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权衡和取舍。对于实力明显强于其他成员的国家来说，联盟的主要功能反而是通过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己的安全，换取小国的让步以提高自身决策的自主性。^④很难想象冷战时期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能够对美国本土的军事安全提供任何有实质意义的保护。^⑤此外，

① 季玲：《重新思考体系建构主义身份理论的概念与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80~81页。

②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27页。

③ David A. Lake, *Entangling Relation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Its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④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for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1991, pp. 904-933.

⑤ 正是由于这种军事相互依赖的高度不对称，华尔兹认为，美国无须仅仅为迎合盟友的需要而做出决策。参见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69-170.

□ 当代亚太

正式的军事盟约还迫使美国必须承担为盟友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这种义务无疑会加大而不是减小美国的安全风险。事实上，冷战时期美国一直担心苏联进攻西欧的行为会将其拖入战争甚至核战争。^①

真正跳出安全动机的窠臼而触及到大国利他行为原因的理论是霸权稳定论。该理论认为，为了维持有利于自身霸权地位的国际秩序，霸权国会主动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包括维护和平和安全、维持自由开放的贸易制度以及稳定的国际货币等。^② 这实际上已经隐舍地引入了利益交换的逻辑，即大国的行为不必然是自助的，通过为其他国家提供好处也同样可能获利。但霸权稳定论只解释了当一个国家成为霸权国之后采取利他行为的原因，而并不关心大国在获得霸权之前采取利他行为的可能性。事实上，霸权稳定论认为，获得霸权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在霸权战争中获胜。^③ 比霸权稳定论走得更远的是等级制理论。在等级制理论看来，二战后的美国之所以会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发展的秩序，其目的是为了从小国那里获得权威和合法性，使得小国甘愿将决策自主权的一部分让渡给自己。^④ 同样遵循利益交换的逻辑，斯特凡·席尔姆(Stefan A. Schirm)更明确地指出，大国能否获得领导地位，关键取决于其在寻求领导权的过程中能否包容和满足这些潜在追随者的利益诉求。^⑤

这种通过利益交换而使自身获利的逻辑并不新奇。在以理性人假定为理论基石的经济学中，“交换”恰恰是市场中行为体互动过程的核心环节。更为一般地，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已反复阐释了人出于利己的动机，会自愿地将自身的利益或资源提供给他人，以换取

①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586页。

② Charles P. Kindleberger, "Dominance and Leadership i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Exploitation, Public Goods, and Free Rid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5, No. 2, 1981, pp. 242-254;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③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97-198; Robert Gilpin,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 in Robert I. Rotberg and Theodore K. Rabb, eds.,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5-37.

④ David A. Lake,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vid A. Lake, "Escape from the State of Nature: Authority and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1, 2007, pp. 47-79; Ahsan I. Butt, "Anarchy and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amining South America's War-Prone Decade, 1932-4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7, No. 3, 2013, pp. 575-607.

⑤ Stefan A. Schirm, "Leaders in Need of Followers: Emerging Powers in Global Governanc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6, No. 2, 2010, pp. 197-221.

他人的回报。这种利益交换的过程，广泛存在于包括权力形成在内的诸多重要的社会互动中。^① 总之，利他行为在根本上也可以是利己的。但问题是，既然利益交换这种方式能够为大国换取其想要的利益（如权力），那么为什么自 1648 年至今，直到 1945 年以后这种权力获取方式才变得普遍而持久，而在此之前更长的时间里，直接的掠夺、胁迫、兼并和武力征服一直是大国权力竞争的主导方式？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大国战略选择的改变？

（二）对问题 2 的解释

对于二战后及春秋时期国际体系出现不同演化轨迹的原因，学者们做出了如下解释。

1. 二战后的国际体系

（1）核威慑

对于二战后国际体系得以长期保持大致和平的原因，核威慑可能是最容易被想到的。在不少学者看来，核威慑对于二战后大国战争的慑止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冷战体系与此前的欧洲均势体系最显著的差异就在于大国对战争的极端谨慎，而导致这种谨慎的原因就在于核武器的出现。^② 对核威慑最极端的质疑是认为它与二战后大国间的和平从根本上无关（essential irrelevance）。^③ 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则倾向于轻视核武器在抑制大国间战争方面的作用。^④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核禁忌规范的存在，大国对小规模

^① 对社会交换理论的详细梳理，参见乔纳森·H. 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 7 版）》，邱泽奇、张茂元等译，华夏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20 章。

^② Robert J. Art and Kenneth N. Waltz, “Technology, Strategy, and the Use of Force”, in Robert J. Art and Kenneth N. Waltz, eds., *The Use of Force*, 2nd edition,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3, p. 28; Kenneth N. Waltz, “Nuclear Myths and Political Realiti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4, No. 3, 1990, p. 740; Robert L. O’Connell, “War: Institution Without Portfolio”, in Richard W. Bulliet,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53-258; Gordon A. Craig and Alexander L.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Diplomatic Problems of Our Tim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05, 107; Michael Mandelbaum, *The Nuclear Revolu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Hiroshim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66, 72.

^③ John Mueller, “The Essential Irrelevance of Nuclear Weap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3, No. 2, 1988, pp. 55-79.

^④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p. 367. 2013 年 11 月 2 日，清华大学举办了一场米尔斯海默与中国学者阎学通的对话，米尔斯海默表示，核武器或许可以阻止战争，但不能阻止安全竞争。参见《阎学通对话米尔斯海默：中国能否和平崛起？》，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yanxuetong/shilu/detail_2013_11/29/31680050_0.shtml。

□ 当代亚太

军事打击使用核报复是难以令被威慑方置信的，这就使得核武器难以慑止小规模战争。^① 更关键的是，核威慑机制并未直接解释为何二战后大国会选择利益交换这种方式来获取和维持权力。假如核威慑的确在二战后大国权力互动模式的维持上发挥了作用，那么我们需要更确切地知道，它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机制中、在什么环节上起作用。

(2) 主权规范

主权规范是抑制二战后大国武力扩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征服行为失去了合法性，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性规范。^② 相关实证研究也显示，受国际社会承认的主权规范是维持小国生存的重要原因。^③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主权规范是依靠什么力量得以在二战后维持的？春秋时期的周礼规范同样具有约束诸侯国相互动武的作用，^④ 但为何二战后的主权规范能够得以维持和强化，而春秋时的周礼规范却不能？法扎尔认为，主权规范之所以会在 1945 年之后得以维持和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美国对该规范的倡导和坚持。^⑤ 且不说美国在二战后曾多次做出违反主权规范的行为，^⑥ 问题在于美国为什么会愿意长期自愿接受主权规范的束缚？主权规范的维持和强化更像是一种结果而非原因，很可能存在另一个更为基础性的机制，使得二战后的大国出于理性的考虑而不再采取征服和兼并战略。

(3) 社会进化

在另一些学者看来，二战后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国际战争和军事征服是国际体系进化的自然结果。约翰·缪勒（John Mueller）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战争曾经有过的正面评价，不进行

① 李彬、肖铁峰：《重审核武器的作用》，载《外交评论》2010年第3期，第4~5页。相应的实证检验参见 Robert Rauchhaus, "Evaluating the Nuclear Peace Hypothesis: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3, No. 2, 2009, pp. 258-277.

② Sharon Korman, *The Right of Conquest*.

③ Robert H. Jackson and Carl G. Rosberg, "Why Africa's Weak States Persists: The Empirical and the Juridical in Statehood", *World Politics*, Vol. 35, No. 1, 1982, pp. 1-24.

④ 参见本文第四部分。

⑤ Tanisha M. Fazal, *State Death*, pp. 47-53.

⑥ 例如，冷战时期美国对危地马拉、古巴、尼加拉瓜等拉美国家主权的侵犯。最近的例子包括 2003 年在未取得联合国合法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伊拉克战争。

战争已经逐渐内化为人们的一种超越理性计算的规范。^① 唐世平则指出，随着征服和兼并的持续发生，征服本身的难度和成本随之增大，最终导致大国的征服行为在 1945 年以后近乎消亡。^② 这种演化的视角无疑是重要的。但就具体的演化机制而言，唐世平的理论过于强调国家的生存动机，而忽视了地位和权力等其他更为重要的推动体系演化的动力来源。^③ 遵循社会演化视角的理论更需要解释的是，在权力追求这个动机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在有的体系中大国权力竞争的手段能够保持相对克制，而在别的体系中却不能？

此外，因战争的巨大代价促发的和平主义观点并不必然导致和平的维持。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惨重损失的刺激，一战后和平主义思潮在欧洲迅猛发展。^④ 然而由这种思潮所引发的绥靖主义战略却非但没有防止、反而加速了二战的爆发。春秋中后期，由于连年战乱，当时的国际社会也曾出现强烈的和平和止战思潮。公元前 546 年，宋国提议晋楚两国弭兵。行人韩宣子对晋国执政赵武说：“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菑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晋国因担心拒绝弭兵会使自己在国际舆论和合法性上陷入被动，丧失国际动员能力，于是同意与楚国弭兵。^⑤ 一个大国是否支持停战居然有可能影响到其盟主地位，足见当时国际社会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思潮有多么强势。然而，这同样未能阻挡此后各大国间的相互征伐。

(4) 其他次要的解释

结构现实主义和均势理论将冷战体系的稳定与和平归因为两极这个特殊

^① John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9; John Mueller, *The Remnants of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John Mueller, “War Has Almost Ceased to Exist”, pp. 297-321.

^② Shiping Ta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hiping Ta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Mearsheimer to Jervis”, pp. 31-55.

^③ 有学者指出，对荣誉和地位的追求才是战争爆发的主要动机。参见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Richard Ned Lebow, *Why Nations Fight*.

^④ Peter Brock and Nigel Young, *Pacif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yracuse, N. 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9, Chap. IV; Stanislav Andreski, “Pacifism and Human Nature”, in Peter van den Dungen, ed., *West European Pacifism and the Strategy for Peace*, London: Macmillan, 1985, p. 15; Martin Ceadel, *Pacifism in Britain 1914-1945: The Defining of a Fai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0.

^⑤ 《左传·鲁襄公二十七年》。

□ 当代亚太

的国际结构。^① 自由主义理论则强调国际贸易和经济相互依赖对大国间战争的抑制作用。^② 除了学界对上述解释已有的批评外，春秋体系的经验事实显示，这两种解释至少是不充分的。大约在公元前 632 年至公元前 458 年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春秋体系处于晋楚两极格局下。^③ 而根据许倬云的考证，春秋时期，经济贸易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和繁荣，不同地区的商品生产已经出现了专业化，经济相互依赖也已随之产生。^④ 然而，这些因素都未能阻止春秋体系向充满征服和杀戮的战国体系的演化。

2. 春秋国际体系

(1) 周王室权威衰落

这是解释春秋体系向战国体系演化的最主流观点。例如，董青岭认为，春秋时期周王室实力和权威的衰落使其无法再有效地制约诸侯国的行为，从而使得各诸侯国开始以自身利益作为其行为的出发点，由此导致了国家间的互动向着彼此冲突的模式演化。^⑤ 周方银、徐进也认为，周王室权威和合法性的下降，导致了“尊王”战略逐渐难以帮助大国从周王室那里获取足够的政治利益，因此“尊王”战略逐渐被边缘化。^⑥ 王日华强调了周天子的道德在体系转变过程

^① Kenneth N. Waltz, "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 *Daedalus*, Vol. 93, No. 3, 1964, pp. 881-909; John Lewis Gaddis,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0, No. 4, 1986, pp. 105-110.

^② 这方面的文献不胜枚举，参见 Richard Rosecrance, *The Rise of the Trading State: Commerce and Conquest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Edward D. Mansfield, *Power, Trade, an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Alfred Tovas,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Stable Peace-Making", in Arie M. Kacowicz, et al., eds., *Stable Peace among Nation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0, pp. 150-164; Erik Gartzke and Quan Li, "War, Peace, and the Invisible Hand: Positive Political Externaliti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47, No. 4, 2003, pp. 561-586; Edward D. Mansfield and Brian Pollins, eds.,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New Perspectives on an Enduring Debat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③ 叶自成：《中国崛起》，第 12 页；王日华、漆海霞：《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相关性统计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117 页。相比之下，当时的齐、秦两个大国则只能算作二等大国，参见黄朴民：《梦残干戈》，第 22 页。

^④ Cho-yun Hsu,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 C.*,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116-122.

^⑤ 董青岭：《复合建构主义》，第 151~164 页。

^⑥ 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第 4~34 页；徐进：《春秋时期“尊王攘夷”战略的效用分析》，第 38~61 页。

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周天子自身的行为违反了周朝自身的礼仪规范，从而导致“周德”渐衰，进而促使国际体系从春秋向战国的转变。^①

此类解释存在的问题是：首先，即使个体完全以自身利益为决策的出发点，也不一定会导致冲突，还有可能导致合作甚至和谐。在类似完全竞争市场的情境下，个体的利己决策可能使得社会整体利益趋于和谐。即使在类似非完全竞争市场的情境下，长期的理性互动依然可能催生合作。^②

其次，周王室的权威和周礼在春秋时期的衰落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迅速和彻底。事实上，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前、中期，传统的宗法观念依然深植人心，周天子至少在名义上依然是天下共主，^③ 所谓“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④ 正因如此，直到春秋中后期，依然存在大国主动“尊王”的现象。公元前 520 年至公元前 503 年，周王子朝作乱。晋国多次出兵勤王，并派兵戍守成周，直至最后彻底平定叛乱，派兵迎送敬王返都。此次“尊王”历时 18 年，其间经历晋顷公、晋定公两朝。^⑤ 如此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尊王”，足见周王室的权威直至春秋晚期依然存在。

最后，周王室的强大和权威性（有德）不是各国采取利益交换战略的必要条件。本文第三部分将会展示，当满足特定条件时，“通过利益交换获取权力”将是大国博弈的占优战略。从经验上看，对于那些原本不属于周朝分封体系的国家，或者处于周王室衰落之后的国家，也都曾采取利益交换战略。例如，在春秋前期的公元前 654 年，由于郑国不参加首止会盟，诸侯联合讨伐郑国。当时尚被视为蛮夷的楚国为拉拢郑国，就派兵围攻许国以救援郑国。^⑥ 春秋后期，周王室的实力以及权威已极度衰落，但在公元前 598 年，楚国平复其属国陈国内乱后一度将陈国吞并为自己的一个县，随后楚庄王在

① 王日华：《道义观念与国际体系的变迁——以春秋战国时期为例》，载《国际观察》2009 年第 1 期，第 54~60 页。

②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吴坚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Jonathan Bendor and Piotr Swistak, “The Evolutionary Stability of Cooper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2, 1997, pp. 290-307; Ulrich Witt, “Between Appeasement and Belligerent Moralism: The Evolution of Moral Conduc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ublic Choice*, Vol. 106, No. 3/4, 2001, pp. 365-388.

③ 黄朴民：《梦残干戈》，第 21 页。

④ 《左传·鲁僖公二十五年》。

⑤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8 页。

⑥ 《左传·鲁僖公五年》；《左传·鲁僖公六年》。

大臣申叔的劝谏下又复封陈国。《左传》评价楚国这一行为“有礼也”。^①

(2) 蛮夷消亡

徐进指出，随着中原国家“攘夷”战略的不断实施以及中原文化向周边的扩散，导致蛮夷部族逐渐消亡或“中原化”，这使得“攘夷”这种利益交换战略逐渐因无夷可攘而不再适用。^② 这种解释本身是成立的，但并不能完全解释问题 2。“攘夷”的实质是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它只是利益交换的具体实现形式之一，而非全部。无论是否处于同一民族或文化阵营，只要存在权力与安全的互补性需求，就存在利益交换的可能性。冷战时期美国为西欧提供安全保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的军事威胁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威胁。苏联解体后，这两种外部威胁都消失了，但这并未改变美国对其盟友继续提供安全保障的战略。公元前 638 年，宋襄公联合诸国讨伐归附楚国的郑国，当时仍被视为蛮夷的楚国出兵救郑，并在著名的泓水之战中大败宋军。^③ 显然，救援国和被救援国是否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身份认同，与利益交换战略的实施无关。

(3) 恶性竞争

冷鸿基认为，春秋时期的大国为争夺权力和地位而产生竞争，而权力这种利益又是不可分割和让渡的，因此大国之间难以就权力名位达成协议，只能转而依据效率最大化的原则，以任何可能扩大自身权势的方式去竞争。这种恶性竞争导致了原有的合作制度的破坏、合作规范的退化以及敌人身份的强化。^④ 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国家对权力的追求和争夺是根植于人性的一种本能，^⑤

① 《左传·鲁宣公十一年》。

② 徐进：《春秋时期“尊王攘夷”战略的效用分析》，第 38~61 页。

③ 《左传·鲁宣公二十二年》。

④ 冷鸿基：《制度内恶性竞争与春秋时期国际合作规范退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3 期，第 115~133 页。

⑤ 在很长时期内，似乎一谈及人性追求权力就是“不科学的”。然而，演化生物学、演化心理学的大量科学实验显示，对支配地位的渴望是动物的一种自然本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说追求权力是一种人性甚至都不准确，应当说是一种动物性）。质疑或者无视人类存在权力需求的理论，反而才是不科学的。有关演化生物学与国家动机的关系，参见 Arthur J. Robson, “Evolution and Human Na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6, No. 2, 2002, pp. 89-106; Bradley A. Thayer, “Bringing in Darwin: Evolutionary Theo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2000, pp. 124-151; Roger D. Masters, “The Biological Nature of the State”, *World Politics*, Vol. 35, No. 2, 1983, pp. 161-193。演化心理学的相关实验综述参见 D. M. 巴斯：《进化心理学：心理的新科学》，熊哲宏、张勇、晏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89~396 页。

而权力作为一种零和性利益，^① 不同行为体对它的争夺无法实现协调更是一种常态。但显然，并不是所有体系都会因权力争夺而退化到了像战国体系那样的霍布斯状态。

二战后体系就是一个明显的反例。如冷鸿基所说，春秋时期体系内大多数国家有着较强的集体认同感，彼此最初是以朋友身份互动的。^② 与之相比，二战后初期美苏之间很快就将对方视为敌人和对手，并按照这种身份认同进行互动。据此说来，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互动应当比春秋体系的大国互动更快、更严重地退化到“不择手段”的恶性竞争中去。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冷战最终以和平的方式结束。美苏的权力竞争的确使得不干涉他国内政等规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但从整体来看，二战后所确立的国际社会的核心规范，如主权完整和领土不得兼并等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维护，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使用、核武器的削减等方面的暴力约束规范更是得到了较好的遵守和内化。我们很难将美苏间的冷战视为“不择手段”的恶性竞争的另一个佐证。

三、理论准备和理论模型

（一）理论准备：行为体获利的两种根本方式

从根本上说，除了自给自足之外，人从社会上获利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暴力和胁迫掠夺他人的物品，二是与他人进行物品交换。^③ 与暴力掠夺相比，自由平等的交换往往是一种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从社会整体福利的角度看，交换方式无疑应当受到鼓励。^④ 而决定人是否选择以交换这种良性方式获取利益的根本因素在于，物品的所有权是否得到了有效保障。正如马克思所说：“交换的唯一前提是每个人对自己产品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⑤

①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常数和”性的利益。

② 冷鸿基：《制度内恶性竞争与春秋时期国际合作规范退化》，第119页。

③ 孙志海：《自组织的社会进化理论：方法和模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④ 张维迎：《博弈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帕累托改进是指，改变一种状态，在所有人的处境都没有变坏的同时，至少有一个人的处境变好。显然，暴力掠夺和胁迫行为至少会使一方的处境变坏，还有可能两败俱伤，它不可能是帕累托改进。而受个体需求支配的自由交换行为，则有可能使双方的处境都改善，因而有可能实现帕累托改进。

⑤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1页。

当所有权缺乏有效保障时，就有可能出现掠夺和胁迫。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就曾描述过这种情形：“这种人人相互为战的战争状态……还是下面情况产生的结果，那便是没有财产，没有统治权，没有‘你的’、‘我的’之分；每一个人能得到手的东西，在他能保住的时期内便是他的。”^①

在国际政治中，大国所追求的最主要的“物品”是权力。^② 权力最核心的内涵是“让他人做其原本不愿做的事的能力”。^③ 而要让他国遵从自己的意志，大国同样也有两种根本性的途径可以选择：一是对那些不遵从自己意志的国家实施暴力惩罚，二是让那些遵从自己意志的国家获得好处。前一种途径可以统称为武力胁迫，后一种可统称为利益交换。利益交换区别于武力胁迫的核心特征是，在前者中，互动双方为了获得各自的利益，都需为对方做什么，而不是不做什么。如果 A 国向 B 国许诺，B 国若遵从 A 国的某项意志，A 国将不入侵 B 国，那么这种“许诺”就不属于利益交换，而是武力胁迫。^④

依据上述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可以推测，当大国的权力争夺对象——主要是体系中的小国——对自己的一切拥有“所有权”时，大国将倾向于选择利益交换战略。国家的“所有权”就是主权，因此，当主权规范强化到一定程度时（如在二战后），我们应当能够观察到比较多的大国利他行为。另一种可能是：小国虽然不拥有对自己的“所有权”，但存在另一种体系规范（例如春秋时的周礼），规定大国无权剥夺小国的行动自由和决策自主性，^⑤ 那么大国同样会倾向于选择利益交换战略。当然，除此之外，如果基于某种客观的物质性的原因（如武力征服的难度太大），大国也有可能选择利益交换战略。

（二）理论模型

1. 作为占优战略的利益交换战略

为更深入地探究大国选择利益交换作为权力竞争战略的条件，我们有必要首先在抽象层面构建一个博弈模型，该模型将建立在由以下 4 个限定条件

①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版，第 96 页。

②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ichard Ned Lebow, *Why Nations Fight*; Jonathan Kirshner, “The Tragedy of Offensive Realism: 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8, No. 1, 2010, pp. 53-75.

③ Robert A.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Behavioral Science*, Vol. 2, No. 3, 1957, pp. 202-203; 丹尼斯·朗：《权力论》，陆震纶、郑明哲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 页。

④ 这实际是武力胁迫方式中的“勒索”。

⑤ 依据周礼，只有周天子拥有这种权利。参见本文第四部分。

所定义的特定情形之下。

条件 1：在初始状态下，小国享有自主决策的权利。这包含两层含义：首先，在大国争夺前，小国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小国的一切行为只听命于自己；其次，大国剥夺小国的自主性会面临规范和合法性上的压力。

条件 2：大国所争夺的是对小国的主导权。这意味着大国所争夺的是一种零和性利益，这种利益难以被分割。

条件 3：对于特定的某个（或某些）小国，有不少于两个大国有足够的意愿将其作为自己的权力争夺目标。这有两层含义：首先，大国在谋求对某个（或某些）小国的主导权时，面临与其他大国的竞争；^①其次，所有参与权力竞争的大国都有足够的竞争意愿，竞争意愿不是它们选择战略时的约束条件。

条件 4：对于参与权力竞争的各个大国来说，物质实力（资源）不是其选择战略时的约束条件。

政治学的一个基本常识是，相比较于单纯依靠暴力，通过为被统治者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秩序更容易形成统治的合法性。^②这意味着，对于小国而言，利益交换战略比武力胁迫战略更具有吸引力。根据条件 3，存在不止一个觊觎主导权的大国，那么假设 A 大国选择通过利益交换（比如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争取某小国的支持，而 B 大国则选择对该小国实施武力胁迫以争取其支持，在条件 1 满足的情况下，该小国几乎肯定会倒向 A 国而非 B 国。^③这意味着，当 B 国选择武力胁迫战略时，A 国的理性选择是利益交换战略。而如果 B 国也采用利益交换战略为小国提供好处，此时 A 国的理性选择依然是利益交换战略。因为如果 A 国此时选择对小国实施武力胁迫，就会迫使该小国倒向 B 国。由此可见，无论 B 国选择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A 国选择利益交换都比选择武力胁迫更合算。

在条件 1 下，小国拥有保持自主的权利，大国对小国施加武力胁迫会付

^①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某个特定时期体系内只存在一个有能力问鼎霸权的大国，但存在其他有潜在在不远的未来拥有这种能力的国家，前者在决策时也须考虑到未来可能的权力竞争。

^②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Mancur Olson, *Power and Prosperity: Outgrowing Communist and Capitalist Dictatorship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David Lake, "Escape from the State of Nature: Authority and Hierarchy in World Politics", pp. 47-79.

^③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国脱离苏联阵营转而与美国接近，80 年代末东欧国家在苏联放松对其的控制后积极接近西方，都是大国无战争时代以武力胁迫方式争取小国政治支持而遭遇失败的典型例证。

□ 当代亚太

出一定的成本（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设为 c ($c > 0$)。而在竞争态势下，如前所述，一个大国对小国进行武力胁迫，会有助于另一个大国获得对该小国的主导权，武力胁迫战略给竞争对手带来的收益设为 b ($b > 0$)。因此可以得到如图 1 所示的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取舍博弈矩阵。

		B 大国	
		武力胁迫	利益交换
A 大国	武力胁迫	$b - c, b - c$	$-c, b$
	利益交换	$b, -c$	$0, 0$

图 1 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取舍博弈

在这一博弈中，无论对方选择武力胁迫还是利益交换，己方选择利益交换都比选择武力胁迫更划算。^① 因此，利益交换是这个博弈的占优战略，（利益交换，利益交换）是该博弈的占优战略均衡。这一博弈显示，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武力胁迫也并不必然是大国权力竞争的最佳战略；在特定形势下，利他而非攻他反而拥有压倒性的优势。

这个博弈得以运转的关键条件是，存在一种强势规范，为小国的独立自主赋予合法性，并使得大国伤害小国自主性的行为面临规范压力。换言之，条件 1 必须满足。与此同时，其他 3 个条件也必不可少。首先，必须处于一种竞争态势。当只有一个大国谋求主导权而没有任何竞争对手时，即使存在规范的约束，武力胁迫和扩张也很有可能是该大国的首选战略。^② 其次，参与竞争的大国必须具有足够的物质实力和战略意愿。两者缺一，都会改变上述博弈的支付，甚至使得博弈情境不存在。^③ 最后，大国所争夺的必须是不可分割的对某个（或某些）小国的主导权。如果所争夺的利益可以分割，上述博弈也无法运转。^④ 正是由于这些条件的限制，因此在实际的国际关系进程中，在很

① 因为 $c > 0$ ，所以显然有 $0 > -c$ ， $b > b - c$ 。但需注意的是， b 和 c 的大小关系不确定，因此我们尚不知道这个博弈的均衡状态（利益交换，利益交换）是否同时也是该博弈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② 例如，春秋时期的秦国，其于秦穆公时成为西戎霸主的主要战略是向西军事扩张和征服。这主要就是由于受地理条件和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西北地区除了秦国外，没有其他大国参与争夺。参见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 1 册），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99 页。

③ 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原属苏联卫星国的东欧国家改变其政治经济制度、投向西方阵营而没有遭到苏联的阻止，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苏联不再具有足够的战略意愿。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北约不断向东吸纳东欧国家，则主要因为当时的俄罗斯不再具有与美国争夺小国的物质实力。

④ 例如，1939 年德国和苏联对波兰都只满足于争夺到一定的领土，因此当时两国得以达成一项题为《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协议，彼此使用武力胁迫战略瓜分波兰。

长时期内利益交换都不是大国权力竞争的主导战略；而即使在某段时期内利益交换成为了主导战略，在全体系范围内，武力胁迫战略也很难完全消失。

当然，在无政府状态下，后 3 个条件得到满足相对更为常见。这意味着，是否存在阻止大国剥夺小国自主性的规范，是决定大国战略取舍的天平向哪一边倾斜的关键条件。

2. 大国权力竞争博弈的演化稳定分析

当大国选择以利益交换战略来争夺权力时，意味着上述 4 个条件都得到满足。在这个博弈中，武力胁迫战略是严格劣势战略（strictly dominated strategy，如图 1 所示）。然而，以下的演化博弈模型则显示，即使在初始状态下上述 4 个条件都得到满足，武力胁迫这种严格劣势战略依然有可能最终取代利益交换战略，成为大国权力竞争的首选战略。

在现实中，大国权力竞争的互动不会只进行一轮，而是一种无法预知终点的无限多轮博弈。在重复互动中，大国除了“始终武力胁迫”和“始终利益交换”两种战略外，还有其他多种可能的战略选择。限于篇幅，这里仅考虑在其他各种战略选择中最具竞争力的一种：针锋相对战略（tit-for-tat strategy），即大国首轮选择武力胁迫战略，然后从第二轮开始，选择对方上一轮所选择的战略。^① 在此情况下，当该博弈进行了两轮之后，^② 如不考虑贴现，各战略的支付如图 2 所示。^③

		B 大国		
		始终武力胁迫	针锋相对	始终利益交换
A 大国	始终武力胁迫	2(b-c), 2(b-c)	2(b-c), 2(b-c)	-2c, 2b
	针锋相对	2(b-c), 2(b-c)	2(b-c), 2(b-c)	-c, b
	始终利益交换	2b, -2c	b, -c	0, 0

图 2 两轮重复博弈后各战略的支付情况

① 如图 1 所示的大国权力竞争方式取舍博弈在博弈结构上与囚徒困境博弈完全一样，而在无限多轮囚徒困境博弈中，预期效用最大的战略就是针锋相对战略。参见 Robert Axelrod,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Nor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1986, pp. 1095-1111;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

② 根据第 2 轮支付值和根据第 n 轮 ($n \geq 2$) 支付值计算分析的结果是等效的。

③ 实际上，大国权力竞争的互动往往是动态的，但从长期重复博弈的视角看，静态博弈和两阶段动态博弈的演化结果是等价的。参见谢识予：《经济博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19 页。将大国冲突战略演化的单轮博弈简化为静态博弈的模型，还可参见 Ulrich Witt, “Between Appeasement and Belligerent Moralism”, pp. 365-388。

□ 当代亚太

为探究大国权力竞争博弈的演化稳定性，以下引入复制者动态 (replicator dynamics) 模型的分析方法。其基本逻辑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竞争态势的存在，那些较低收益的战略会在长期的博弈中逐渐被那些较高收益的战略所取代，较高收益的战略则会被“遗传”和复制。^① 换言之，如果在某一轮中某战略的收益大于所有战略的平均收益时，下一轮中该战略的使用频率就会增加，而其他战略的使用频率则会减少。^②

以下设始终武力胁迫战略的频率为 x ($0 < x < 1$)，针锋相对战略的频率为 y ($0 < y < 1$)，始终利益交换战略的频率为 z ($z = 1 - x - y$)。那么选择始终武力胁迫战略的预期收益值为： $2(b-c)x + 2(b-c)y - 2cz = 2bx + 2by - c - c(1)$ ；选择针锋相对战略的预期收益为： $2(b-c)x + 2(b-c)y - cz = 2bx + 2by - c - (x+y)c(2)$ 。

因为 $x+y < 1$ ，所以 (2) 式恒大于 (1) 式。换言之，始终武力胁迫战略是针锋相对战略的弱劣势战略 (weakly dominated strategy)。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始终武力胁迫战略会被针锋相对战略所替代。为便于分析，现将始终武力胁迫战略从图 2 所示的矩阵中剔除，得到一个精炼后的大国权力竞争博弈矩阵 (如图 3 所示)。

		B 大国	
		针锋相对	始终利益交换
A 大国	针锋相对	2(b-c), 2(b-c)	-c, b
	始终利益交换	b, -c	0, 0

图 3 精炼后的大国权力竞争博弈

① 在纯粹的复制者动态模型中，“遗传机制”与“选择机制”实际是重合的。参见黄凯南：《演化博弈与演化经济学》，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第135页。

② 复制者动态的一般形式是：假设一个博弈有 n 种战略，第 i 种战略在第 t 轮被使用的频率用 r_i^t 表示，第 t 轮该博弈的战略结构为 (r_1^t, \dots, r_n^t) ，其中， $r_1^t + r_2^t + \dots + r_n^t = 1$ 。 $F_i(r_1^t, \dots, r_n^t)$ 表示第 i 种战略的预期收益。 $\bar{F}(r_1^t, \dots, r_n^t)$ 表示这一轮所有战略的平均预期收益， $\bar{F}(r_1^t, \dots, r_n^t) = r_1^t \times F_1 + r_2^t \times F_2 + \dots + r_n^t \times F_n$ ，其中， $F_i = F_i(r_1^t, \dots, r_n^t)$ 。根据复制者动态，第 i 种战略在 $t+1$ 轮的频率为： $r_i^{t+1} = r_i^t \times \frac{F_i(r_1^t, \dots, r_n^t)}{\bar{F}(r_1^t, \dots, r_n^t)}$ ，当 $\frac{F_i(r_1^t, \dots, r_n^t)}{\bar{F}(r_1^t, \dots, r_n^t)} > 1$ 时，第 t 轮第 i 种战略的频率增加。有关复制者动态模型的介绍和讨论，参见朱·弗登伯格、戴维·K·莱文：《博弈学习理论》，肖争艳、侯成琪译，陈彦斌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章；乔根·W·威布尔：《演化博弈论》，王永钦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章；谢识予：《经济博弈论》，第220~245页。

现在设针锋相对战略最初的使用频率为 r ($0 < r < 1$)，那么始终利益交换战略最初的使用频率为 $1-r$ 。此时针锋相对战略的预期收益为： $2(b-c)r - c(1-r)$ (3)；始终利益交换战略的预期收益为： br (4)。

根据复制者动态的定义，当 (3) 式大于 (4) 式，亦即当 $r > c/(b-c)$ 时，针锋相对战略的频率会在下一轮增加。在 $(0, c/(b-c))$ 这个吸引域中，吸引子为 $r=0$ ；在 $(c/(b-c), 1)$ 这个吸引域中，吸引子为 $r=1$ 。^① 换言之，初始状态下针锋相对战略的频率 $r=c/(b-c)$ 是一个门槛，如果超过这个门槛，我们将会在未来的演化进程中看到越来越多的武力胁迫现象；反之，如果没有达到这个门槛，利益交换战略则会日益盛行。

显然，这个门槛的高低与大国对小国施加武力胁迫的成本 c 和武力胁迫战略给竞争对手带来的收益 b 有关。易知， c 越大， b 越小，这个门槛就越高，武力胁迫战略就越难以成为大国的首选战略；反之， c 越小， b 越大，门槛就越低，武力胁迫战略在演化中击败利益交换战略的可能性就越大。^②

以上的模型分析假定每一轮博弈的支付不变。但在现实中，每轮博弈的支付显然会随着轮次的增多而发生显著的变化。如果针锋相对战略的初始频率超过了上述临界值，大国的武力胁迫行为就会逐渐盛行。随着大国武力扩张和兼并的不断胜利，大国的实力会不断增强。而那些继续选择利益交换战略的大国，在每一次竞争中获胜的难度也会相应地不断增大。武力胁迫战略逐渐增多的收益和利益交换战略逐渐增大的难度，都可以折合为选择利益交换战略的成本（设为 d ， $d > 0$ ）， d 的数值将会随着轮次的增多而逐渐增大到不容忽视的程度。此时大国权力竞争的博弈矩阵将会变得如图 4 所示。

		B 大国	
		武力胁迫	利益交换
A 大国	武力胁迫	$b-c, b-c$	$-c, b-d$
	利益交换	$b-d, -c$	$-d, -d$

图 4 利益交换成本突显后的大国权力竞争博弈

^① 吸引子 (attractor) 是指一种战略频率结构，在该频率结构下，各种战略的频率不会在下一轮发生变化，并且任何突变所导致的战略频率结构的偏离都会最终恢复到这个战略频率结构。如果存在一个特定的数值区间，在该区间内的任何一种战略频率结构都会最终演化为一个吸引子，那么该数值区间被称为该吸引子的一个吸引域 (basin of attraction)。参见朱·弗登伯格、戴维·K·莱文：《博弈学习理论》，第 71~73 页。

^② 以上的模型分析参考了 Joseph E. Harrington, Jr., *Games, Strategies, and Decision Making*, New York: Worth Publishers, 2009, pp. 507-530。

□ 当代亚太

当 $d < c$ 时，虽然该博弈的占优战略均衡还是（利益交换，利益交换），但武力胁迫战略和利益交换战略的支付差距已经不及初始状态时那样悬殊，并且会逐渐缩小。而一旦当 $d > c$ 时，该博弈的占优战略均衡就将发生翻转，变成（武力胁迫，武力胁迫）。不仅如此，由于 $d > c$ ，所以 $b - c > -d$ ，所以（武力胁迫，武力胁迫）同时也将是该博弈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而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行为规则要比那些非帕累托最优状态的行为规则更加具有演化稳定性。^① 因此，武力胁迫战略通过针锋相对这种方式获得演化稳定性的过程具有“自动锁定”功能，即该战略的盛行会导致其更加盛行。

3. 小结

在特定条件下，即使处于无政府状态，追求权力的大国也会采取具有利他性质的利益交换战略。根据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在竞争态势下，即使是那些想通过武力胁迫获取权力的国家，也会在特定博弈结构的约束下，放弃武力胁迫转而采取利益交换。在导致这一特定博弈结构出现并运转的条件中，最关键的条件是体系中存在抑制大国剥夺小国自主性的社会规范。

然而，即便所有条件都满足，并且利益交换战略成为大国权力竞争的占优战略，也并不意味着大国均以利益交换战略参与权力竞争这种良性互动局面一定能够持续下去。大国权力竞争的进程存在两种可能的演化路径：当大国对小国施加武力胁迫的成本越大，而武力胁迫战略给竞争对手带来的收益越小时，大国保持利益交换这种良性互动模式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博弈的均衡状态则有可能发生转移，由原来的（利益交换，利益交换）演变为（武力胁迫，武力胁迫）。一旦发生这种转变，武力胁迫战略盛行的趋势将会不断强化而很难再被逆转。

四、春秋体系的权力竞争过程

在三百多年的春秋历史中，晋楚两国的权力竞争是大国争霸的核心和焦点，晋楚两国的历史构成了春秋史的中坚。^② 有鉴于此，为了更清晰地展示春秋体系的演化进程，我们将春秋史划分为三个时期：春秋时期开始到公元前

^① Jonathan Bendor and Piotr Swistak, "The Evolution of Norm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6, No. 6, 2001, pp. 1524-1527.

^②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第 162 页。

636年晋文公上台为“前晋楚争霸时期”；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勤王到公元前546年向戌弭兵之会为“晋楚争霸时期”；此后为“后晋楚争霸时期”。本部分的分析将表明，前晋楚争霸时期是利益交换战略最为盛行的时期，晋楚争霸时期则开始出现由利益交换战略主导向武力胁迫战略主导的过渡，而后晋楚争霸时期则是此后武力胁迫战略主导大国竞争的开端。

（一）体系总体特点

1. 春秋初期各国对周礼的遵守

春秋时期的周王室虽然不再拥有绝对优势的物质实力，但自西周延续下来的“礼”仍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得到保留和遵守，诸侯国依然沿用西周时的礼仪规范来从事邦交活动。^①对周礼的遵守首先体现为对周天子的尊敬和对天子地位的认可。春秋初期，周天子不仅有天下共主之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尚有其实。^②公元前636年，周王子带引狄兵攻周襄王，周襄王逃至郑国避难，派使者向晋、秦等诸侯国求援。第二年秦穆公即带兵驻守在黄河边上，想送周王回国。晋国大臣狐偃对晋文公说：“求诸侯不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可为矣。”^③于是晋文公辞去秦师，亲自带兵驻在阳樊，并派军迎接周襄王。如果说晋文公勤王还带有利己动机，那么秦穆公面对晋文公请辞秦国军队的请求后就慨然应允，则说明秦穆公事先并没有意识到“勤王”所具有的战略意义，而这正反映出秦国勤王的举动几乎纯粹是出于对周礼规范的遵守。

春秋前期诸侯国遵守周礼的第二个体现是，各国对领土兼并行为有着明显的自我克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④理论上讲，在整个周王朝体系内，除周天子外，任何人都不能对其所处的土地宣称拥有全部的权利。^⑤正因如此，诸侯自行兼并他国领土是不符合礼制的行为。在西周初年至东周初年，国家数量虽然由一千多个减至一百多个，但被

① 徐杰令：《春秋邦交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② 周王室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地位，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参见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上册），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3、200页。

③ 《左传·鲁僖公二十四年》；《左传·鲁僖公二十五年》。

④ 《诗经·小雅·北山》。

⑤ Cho-yun Hsu,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76.

□ 当代亚太

消灭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由原始氏族所封，周王室所封的宗亲之国间并未出现相互兼并的情况。^①到了春秋时期，这种规范依然能够抑制国家兼并他国土地的企图。公元前712年，齐、鲁、郑三国讨伐许国获胜后，齐侯想将许国让给鲁隐公，遭到了鲁隐公的果断拒绝。鲁隐公说：“君谓许不共，故从君讨之。许既伏其罪矣，虽君有命，寡人弗敢与闻。”齐侯又欲将其转让给郑庄公，郑庄公同样不愿久占许国土地。《左传》因而认为郑庄公“于是乎有礼”。^②公元前661年，齐国大夫仲孙湫到鲁国观察鲁国祸乱，齐桓公问他：“鲁可取乎？”仲孙湫说：“不可，犹秉周礼。周礼，所以本也……鲁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君其务宁鲁难而亲之。”^③

春秋前期周礼约束诸侯国行为的第三个重要体现在于其对战争行为的约束。春秋时期以维护周朝正统礼仪规范为思想核心的思想家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④沿袭孔子思想的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进一步指出：“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⑤可见，在正统的周朝礼仪中，只有周王室自上而下对其他国家发动的战争才是正义的，诸侯之间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彼此发动战争都是不正义的。根据王日华和漆海霞的统计，在公元前769年至公元前440年之间，^⑥受周王室直接分封建国的姬姓诸侯国彼此之间发生战争的频率和次数，都显著低于姬姓诸侯国与非姬姓国家之间的战争。这说明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周朝分封体制内部，在中央权威的强制性力量已大为衰落的情况下，其所遗留的既有的政治秩序仍然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维持。^⑦

2. 权力竞争的方式

春秋中期以前体系内大国普遍使用的“尊王攘夷”战略，其内在的逻辑

① 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册），第102页。

② 《左传·鲁隐公十一年》。

③ 《左传·鲁闵公元年》。

④ 《论语·季氏》。

⑤ 《孟子·尽心章句下》。

⑥ 历史学界一般将春秋时期的起始年份定为公元前770年。对春秋时期的结束年份则存在不同看法，有的定为公元前481年，有的定为公元前476年，有的则定为公元前453年。但无论以哪一种看法为准，这里的公元前769年至公元前440年这一区间，都显然涵盖了整个春秋时期以及战国时代初期。

⑦ 王日华、漆海霞：《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相关性统计分析》，第112、120页。

就是利益交换。所谓“尊王”，就是在实施“尊王”战略的大国与周王室之间发生的利益交换：大国通过“尊王”，为周王室提供安全保障，维护作为王权基石的分封制度所形成的现有政治格局，^①与此同时，周王室为大国的行为提供合法性，减少大国对外扩张的阻力。所谓“攘夷”，则是实施“攘夷”策略的大国与遭受夷狄侵犯的小国之间发生的利益交换：大国通过“攘夷”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换取小国对大国国际地位和国际权威的认同。

当然，即使是在春秋初期，大国争夺威望和权势的方式也并非仅有利益交换这一种，而是利益交换和武力胁迫两种方式兼有。齐桓公称霸前体系内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是郑庄公时期的郑国，郑国在与邻近的宋、卫等国争衡时，曾于公元前714年以宋公不朝见周王为名，兴兵讨伐宋国，逼迫宋国屈服。^②这显然是一种武力胁迫。而公元前706年，北戎入侵齐国，齐国向郑国求救，郑庄公于是派太子忽领兵救齐，打败戎兵。^③这显然又是利他的利益交换。而在齐桓公以前，齐僖公、襄公时代的齐国也曾屡次以战争的方式逼迫世仇纪国臣服。^④

相比较于周王室分封的国家，那些并非周朝分封国和诸侯国的国家，如楚国和秦国，其武力胁迫策略使用得更为频繁。^⑤春秋早期，楚武王、文王时期就曾先后征服随、邓、郟、绞、申、息等周边小国。^⑥秦国则由于晋国的阻挠，在整个春秋时期都未能将影响力扩展到中原地带。因此，秦国除了几次与晋国的交战外，其战略方向主要是向西征服诸戎。秦穆公于公元前623年并灭十二个戎国，辟地千里，由此成为西戎的霸主。^⑦

“征伐自天子出”、“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样的周礼，是抑制大国兼并小国领土、促使利益交换逻辑运转的重要初始条件。然而，即使是在周礼维

① 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上册），第91页。

② 《左传·鲁隐公九年》。

③ 《左传·鲁桓公六年》。

④ 童书业：《春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

⑤ 秦、楚、吴、越等国的建立和发展与周王室没有重大的关联，它们既非因周朝的分封而建（秦的受封是后来的事），也没有替周王室保卫和控制周朝四方土地的义务，其土地从来不是周的土地，与周王室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它们是当时国际体系的边缘国家。参见叶自成：《中国崛起》，第61～66页；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87.

⑥ 童书业：《春秋史》，第129～131页。

⑦ 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册），第199页。

持得最好的春秋初期，大国对小国的征伐和兼并也普遍存在，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有限理性，大国的决策者难以非常准确地分析出最优战略，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周王室的权威相对不足，从而导致周礼规范的内化程度不够。根据前述的模型分析，春秋体系初始状态下武力胁迫行为的常见和普遍，应当是其未能像二战后体系那样演化为一个以利益交换为主导的体系的初始性原因。

3. 武力胁迫和利益交换两种战略的相对难易程度

春秋体系中大国互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军事进攻的随意性，体现为大国在征伐某个国家的过程中，在没有事先准备的情况下“顺便”侵犯另一个国家。这种现象在整个春秋时期都非常普遍。例如，公元前 656 年，齐桓公为报复楚国此前对郑国的入侵，联合诸侯侵袭楚国的属国蔡国，将蔡国击溃后又顺道伐楚。公元前 598 年，楚庄王征伐郑国使得郑国和陈国臣服之后，又顺道侵犯宋国。公元前 585 年，楚国乘晋国攻打宋国时讨伐晋国的属国郑国，晋国回兵救郑，楚军撤退，晋国仍不撤兵，而是顺道入侵楚国的属国蔡国。公元前 583 年，晋国乘楚国与吴国交战国势稍弱，又起兵侵犯蔡国，顺道入侵楚国，击败楚军后又顺势侵服楚国的属国沈国和郟国。公元前 550 年，齐国乘晋国内乱，起兵攻打卫国，然后又顺道入侵晋国。^①

军事入侵决策的随意性反映了当时武力胁迫战略实施的难度和成本都较低。相比较而言，利益交换战略有效实施的难度则较大。这主要体现在，当某大国对某小国发动突然的军事入侵时，愿意为该小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大国有时难以及时为其提供这种保障。一个典型的例证是，公元前 618 年，楚穆王乘晋灵公即位后年纪幼小，晋国国内政局不稳，起兵攻打晋国的属国郑国，囚禁了郑国大夫公子坚、公子龙和乐耳，郑国只得和楚国讲和。晋国摄政大夫赵盾得知楚国侵郑后，带领鲁、宋、卫、许诸国军队救郑，但还没有追上楚军，后者就已经将郑国打败了，晋国只得作罢，郑国也因此只得归服于楚国。^②在这次事件中，郑国倒向征伐它的楚国一边，反映出在无法及时得到大国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小国面对武力胁迫会非常敏感。春秋时期武力胁迫战略有效实施的难度相对较低，意味着其实施成本较低，这应当是春秋体系未能演化为一个以利益交换战略为主导的体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① 童书业：《春秋史》，第 142~143、177、185、197 页。

^② 《左传·鲁文公九年》。

（二）前晋楚争霸时期

在春秋史的三个时期中，前晋楚争霸时期距离西周等级体系的时间最近，周礼在体系中的认同度最高，这一时期大国的行为选择受当时体系规范约束的程度也相应较高，因此，这一时期利益交换战略在大国权力竞争中所占的比重也是三个时期中最大的。这一时期唯一获得体系范围主导地位的齐国，其称霸的过程就基本遵循了利益交换的战略逻辑。

1. 齐国争霸战略中的利益交换思想

谋臣管仲的思想对齐桓公时期齐国争霸战略的制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面对究竟是通过武力还是非武力方式争取他国臣服这一争霸战略的核心问题，管仲明确建议齐桓公慎用军事征伐的手段。他说：“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则大国亦将正卒伍，修甲兵，则难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国诸侯有守御之备，则难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诸侯，则事可以隐令，可以寄政。”^① 在管仲看来，无论是对大国还是对小国，依靠军事手段都难以迅速地将其征服。

正是基于这种战略评估，管仲为齐桓公制定的争霸的基本战略思想是“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② “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③ 强调团结诸侯，为此必须崇尚信义，拯灾恤邻，救危扶倾，以获得各国的人心。^④ 具体的政策包括：首先，在政治领域，将之前侵犯邻国的土地归还给邻国。“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归鲁之侵地常潜，归卫之侵地吉台、原始、柴里，归燕之侵地柴夫、吠狗”，使邻国亲近齐国。其次，在经济领域，对邻国免除关税。“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最后，在国家间交往上，对其他国家的聘问实行“厚往薄来”的政策，“轻其币而重其礼”，“令齐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报。齐以马往，小侯以犬报”。^⑤

2. 齐国争霸战略的实施

齐桓公争霸战略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尊王攘夷”。如前所述，“尊王”

① 《国语·齐语》。

② 《左传·鲁僖公七年》。

③ 《国语·齐语》。

④ 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册），第136~137页。

⑤ 《国语·齐语》。同时参见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册），第137~138页。

□ 当代亚太

和“攘夷”的本质都是利益交换，齐桓公正是通过这两种利益交换战略，成功地换取了周王室赋予其的行动合法性以及其他诸侯国对其地位和政策的认同。

“尊王”方面，齐桓公积极利用周天子的权威，借王室的名义惩罚不服从的国家。公元前681年，齐国为平定宋国的内乱，邀集宋、陈、蔡、邾等国在北杏会盟。随后宋国背叛盟誓。第二年，齐桓公邀集陈、鲁两国联合讨伐宋国，并向周王室请求派王师参战，宋国因而屈服。^①这是自郑庄公假借王命征伐诸侯之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首次出现。^②不仅如此，齐桓公还通过帮助周王室平定诸侯国内政局动乱、维护礼制，换取征伐诸侯的合法性。公元前667年，齐、宋、陈、郑在幽地会盟。周王派召伯廖赐齐桓公为侯伯（即诸侯之长），并命齐桓公讨伐卫国，以惩罚卫国拥立王子颓之罪。第二年，齐桓公奉王命伐卫，迫使卫国臣服。^③此外，齐桓公还直接帮助稳定周王室的政权。公元前653年，周惠王去世，太子郑担心其弟束带作乱，于是向齐国求援。第二年，齐国邀诸侯与周王室在洮地结盟，帮助太子郑即周襄王稳定其王位。^④

“攘夷”方面，齐桓公利用当时北方戎狄和南方荆楚等异族政权不断威胁中原国家安全的事实，通过为小国提供安全保障，换取了小国对其国际领导地位的承认。公元前663年，山戎侵略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第二年齐国派兵北伐山戎，一直进兵到孤竹国。燕庄公送齐桓公到齐国境内，齐桓公以诸侯相送不得出本国边境为由，遂将燕庄公所至的齐国领土用沟分开送给燕国。^⑤公元前661年，狄人侵犯邢国，管仲对齐桓公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请救邢以从简书。”于是齐桓公派兵救援邢国。公元前659年，齐国又联合宋、曹等国军队救援邢国，将邢国迁到夷仪安置。^⑥公元前660年，狄人入侵并消灭了卫国，卫国遗民拥戴卫戴公暂住在曹地的庐舍中，齐桓公于是派公子无亏带领三百乘兵车、三千名甲士帮助卫国戍守曹地。公元前658年，齐桓公又联合诸侯在楚丘筑城，将卫国迁到那

① 《左传·鲁庄公十三年》；《左传·鲁庄公十四年》。

② 童书业：《春秋史》，第138页。

③ 《左传·鲁庄公二十七年》；《左传·鲁庄公二十八年》。

④ 《左传·鲁僖公七年》；《左传·鲁僖公八年》。

⑤ 《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⑥ 《左传·鲁闵公元年》；《左传·鲁僖公元年》。

里复国。^①

春秋前期，楚国尚僻处南方，一时无力与中原诸侯竞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楚国日渐兴起，开始严重威胁到中原地区国家的安全。^② 在抵御楚国威胁、维护中原国家安全方面，齐桓公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公元前666年，楚国令尹子元率领六百乘兵车入侵郑国，齐国和鲁宋等国联军赶来救援，楚军闻讯后连夜逃走。^③ 公元前659年至公元前657年，楚国多次侵犯郑国。齐国召集鲁、宋、陈、卫、郑、许、曹等诸侯出兵讨伐楚国的属国蔡国，以此逼迫楚国退兵。蔡国溃败，诸侯联军接着伐楚。楚王派使者与齐桓公交涉，双方在召陵对峙，齐国向楚国展示实力，最终迫使楚国与诸侯结盟。^④

正是由于齐国在谋求体系主导权的过程中做出了利他而非自助的战略选择，“于是天下诸侯知桓公之非为己动也，是故天下诸侯归之”。^⑤ 至少在其他国家看来，齐桓公的一系列战略举动都是“非为己动”，但这种行为最终反而帮助齐国赢得了天下诸侯的归附，这不能不说是利益交换战略在春秋前期大国争霸事业中的一次标志性的胜利。如前所述，当时的体系规范对土地兼并行为的约束以及武力征服他国的困难，两者共同促成了这种战略在这一时期大国争霸中的首要地位。

（三）晋楚争霸时期

进入到晋楚争霸时期，春秋体系的实力结构由齐国单极转变为晋楚两极。^⑥ 这一时期是春秋体系大国权力竞争模式由利益交换为主向武力胁迫为主过渡的关键时期。晋楚两国相互争霸的轨迹集中而清晰地展示了这一重要过程。

1. 城濮之战及其影响

尊王攘夷战略在帮助齐桓公取得霸主的地位后，很自然地被随后崛起的

① 《左传·鲁闵公二年》；《左传·鲁僖公二年》。

②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第60~62页。

③ 《左传·鲁庄公二十八年》。

④ 《左传·鲁僖公元年》；《左传·鲁僖公二年》；《左传·鲁僖公三年》；《左传·鲁僖公四年》。

⑤ 《国语·齐语》。

⑥ 晋、楚、齐、秦等国当时的国际地位，可以从公元前546年第二次弭兵大会达成的协议加以印证。在此次会议上，楚国令尹子木提议让晋、楚两国的属国互相朝见，最后议定除齐、秦两国外，其他国家共同朝见晋楚两国。参见《左传·鲁襄公二十七年》。当时的国际体系仅有晋楚两国享有令对方属国朝见自己的权利，齐、秦两国既不必分别朝见晋楚两国，又无权享受其他国家的朝见，而其他国家则只能共同朝觐晋楚两国，这反映了当时国际社会对各国国际地位的一种共识。

□ 当代亚太

另一个大国晋国所效仿。^①如前所述，公元前 636 年，周襄王因王室内乱逃至郑国，派使者向晋、秦等诸侯国求援。晋国大臣狐偃劝晋文公抓住这个实施“尊王”战略的时机。晋文公采纳其建议，亲自带兵迎返周襄王。这次“尊王”也为晋国换得了可观的收益，周襄王复位后，将阳樊、温、原、缑茅等战略要地赐给了晋国。

当然，晋国不仅仅获得了土地，更获得了国际威望。公元前 634 年，宋国叛楚投晋，引起了楚国的不满。公元前 633 年冬，楚王亲征，带领郑、陈、蔡、许等国军队围攻宋国。宋国遂向晋国求救。这时利益交换逻辑主导了晋国的决策。晋大夫先轸对晋文公说：“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②可见，在当时的大国决策者看来，为小国提供保护对于其获取权威和霸权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确立了总体战略之后，晋国另一位大夫狐偃又向晋文公提供了为宋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具体策略：“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③以后世的眼光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围魏救赵”策略，其实质是用武力胁迫的方式实现安全保障的目的。^④

面对晋国对曹、卫两国的进攻，楚国派使臣对晋文公说：“请复卫侯而封曹伯，则楚亦释宋之围。”^⑤

出于笼络曹、卫、宋三国“人心”的考虑，晋文公接受先轸的策略，暗地里许诺曹、卫复国，以换取这两国的归附。随后曹、卫果然向楚国告绝。^⑥但这样一来，就使得晋楚两国间的直接战争不可避免，晋国需要冒与楚交战并战败从而一无所获的风险。然而在狐偃等人的劝说下，晋文公接受了这种风险，决心与楚一战。^⑦公元前 632 年，晋楚双方在城濮开战，结果楚军大败。晋文公由此成为诸侯盟主。^⑧

城濮之战是春秋体系中首次发生在两个大国间的争霸战争。这场战争直

① 参见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 1 册），第 147、168 页。

②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③ 在楚国伐宋的前一年，即公元前 634 年，齐国侵犯鲁国，鲁国曾向楚国求来军队攻打宋国。参见《左传·鲁僖公二十六年》；《左传·鲁僖公二十七年》。

④ “围魏救赵”的史实系指战国时期（公元前 353 年）魏国进攻赵国，齐国攻打魏国以救援赵国。参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⑤ 《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同上。

接源于两个大国因受权力欲望的驱使而对一个小国的争夺：楚国试图通过武力胁迫的方式逼迫宋国臣服于自己，晋国则试图利用楚国对宋国的威胁，通过为宋国提供安全保障来争取宋国对自己的臣服。值得注意的是，晋楚双方一开始都不愿与对方直接开战，但最终争夺小国的欲望压倒了对战争的恐惧，从而导致了这场计划外的战争。

这场意外战争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大国在战争中击败另一个大国，开始成为获胜者获得体系性声望和霸权的重要途径。城濮之战的胜利帮助晋国在体系范围内获得了一种威迫性的权威。这场战争虽然在主观上是一场计划外战争，但在客观上，其结果却为晋国以及其他觊觎体系霸权的大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资效仿的争霸战略，即与其他大国进行战争并取得胜利，就能获得霸权。

从晋楚两国此后的权力竞争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以武力胁迫为核心逻辑的争霸战略在体系中的效仿和扩散。城濮之战5年后的公元前627年，晋楚两国再次为争夺一个小国的归附而发生对抗，只不过这次使用武力胁迫策略和安全保障策略的主体发生了对调。当时许国归附楚国，晋国（晋文公已于一年前去世，晋襄公即位）为夺回许国的归附，联合陈、郑两国起兵讨伐许国。楚国则起兵救援。与城濮之战如出一辙的是，为小国实施安全保障的楚国这次也采取了“围魏救赵”式的策略，先侵犯晋国的属国陈国和蔡国以牵制晋军。陈、蔡两国向楚国求和，楚军又顺道攻打郑国。作为回应，晋国又攻打已归附楚国的蔡国。楚军回救蔡国，于是晋楚双方在泚水两岸形成对峙。^① 在此次晋楚之间的竞争中，首先选择武力胁迫战略的国家由楚国换成了晋国。

大国间战争决定霸权地位更直接的体现是公元前597年的晋楚邲之战。公元前597年，楚庄王为迫使郑国彻底臣服自己，起兵围困郑国。晋国旋即救郑。但当晋军到达黄河北岸后，得知郑国已经与楚媾和，楚军还在邲地驻军封锁黄河渡口。晋军内部一度犹豫是否还要为救郑国而与楚国开战。^② 中军佐将先穀力主进兵，他说：“威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丈夫也；为三军之帅而非丈夫，不足以与谋，诸子能为，我不为也。”在其带动下，晋军全军渡河。由此导致晋楚两国在邲地开战，结果楚军大败晋军，于是郑、许等

^① 《左传·鲁僖公三十三年》。

^② 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册），第205页。

国都归附于楚。受邲之战获胜的激励，楚国又派兵攻打宋国及其属国萧国，迫使宋国与其结盟。至此，鲁、宋、郑、陈等中原国家都归附于楚。楚庄王由此确立了其春秋五霸之一的地位。^①

2. 晋、楚两国对郑的争夺

自城濮之战之后，晋楚两国展开了近一个世纪的权力竞争，争夺的核心目标是对中原地区的主导权。地处中原南北交界战略要地的郑国成为晋、楚两极对峙态势下权力争夺的焦点。^② 城濮之战以后，晋、楚两国还爆发过两次事关整个春秋体系战略格局走势的大型会战——邲之战和鄢陵之战。这两场战争都是由两国争夺郑国所引发的。不同之处在于，邲之战中攻打郑国的是楚国，救援郑国的是晋国；而鄢陵之战中攻打郑国的换成了晋国，救援郑国的则换成了楚国。相同之处则在于，两场战争中都是对郑国发动直接军事进攻的一方获得胜利并且赢得对郑国的主导权。^③

在这两场重要战争中，晋、楚两国都曾面临争夺小国的两难处境：如果不为郑国提供安全保障，就将失去这个重要国家的归附，同时失去战略信义和在诸侯中的威望；而如果为其提供安全保障，则将与另一个大国发生直接战争，因而需要承担战争的成本以及战败一无所获的风险。其实这种两难在任何历史阶段的大国争夺小国过程中都会遇到，问题在于大国究竟会在这种两难中如何选择。晋国和楚国最终都选择了后者，即为了争夺小国和体系威望，不惜与对方一战。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春秋时期军事征伐有效实施的难度相对较低，因而激发了大国的机会主义动机。

包括城濮之战在内的三次晋楚会战，虽然都是由其中一方对小国的武力胁迫所引发，但另一方所采取的都是利益交换战略，亦即对该小国提供保护；然而随着互动的增多以及两国对演化博弈结构的“学习”，开始出现两国同时对小国采取武力胁迫战略的情况。公元前565年，郑国侵犯楚国的属国蔡国，楚国起兵讨伐郑国，郑国降楚。^④ 第二年，晋悼公联合诸侯讨伐郑国，郑国又向晋国求和，但又不愿完全臣服于晋国。晋国于是联合诸侯于当

① 《左传·鲁宣公十二年》；《左传·鲁宣公十三年》。

② Cho-yun Hsu,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p. 562. 有关春秋时期中原腹地诸侯国在地理位置上的被动战略态势的详细分析，参见黄朴民：《梦残干戈》，第185~187页。

③ 有关这两场战争的史实经过，参见《左传·鲁宣公十二年》，《左传·鲁宣公十三年》和《左传·鲁宣公十六年》。

④ 《左传·鲁襄公八年》。

年年底再次讨伐郑国。与此同时，楚国因郑国倒向晋国也起兵讨伐郑国。最终郑国又与楚国讲和。^① 晋楚两国同时对郑实施武力胁迫，标志着（武力胁迫，武力胁迫）这一演化博弈均衡正在取代（利益交换，利益交换）这一静态纳什均衡，逐渐成为春秋时期大国权力竞争的常态。

由于晋、楚两国都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武力胁迫战略，而军事救援的效果又总是比军事进攻的效果差，因此处于晋、楚两国夹缝中的郑国才会对大国的武力胁迫更为敏感，更容易倒向对其实施武力胁迫而不是军事保护的大国一方。公元前 564 年，由于郑国倒向楚国，晋悼公联合诸侯讨伐郑国，逼迫郑国签订盟约承诺“唯晋命是听”。很快，楚国也因郑与晋接近而讨伐郑国，郑国就是否应当背叛晋国投降楚国一度产生争议，执政大夫子驷、子展提出：“吾盟固云唯强是从，今楚师至，晋不我救，则楚强矣……且要盟无质，神弗临也……背之可也。”^② 郑国这种“唯强是从”的心理，正是当时小国面对大国争夺时的一种无奈的选择。而小国的这种受武力胁迫影响非常明显的决策倾向，反过来更进一步地强化了大国选择武力胁迫战略的偏好，从而使得武力胁迫战略的使用更加频繁和普遍。

3. 武力胁迫收益的变化

随着武力胁迫战略使用频率的不断提高，其收益也不断增大。经过自城濮之战后半半个多世纪的争夺，晋楚两国彼此都意识到难以获得压倒性优势，在宋国大夫华元的外交努力下，公元前 579 年，两国在宋国西门外结盟，盟誓规定：“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有渝此盟，明神殛之。”^③ 史称“第一次弭兵之约”。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公元前 577 年，郑国攻打楚国的属国许国，楚共王因此想趁机讨伐郑国以救许国。楚国令尹子重、大夫子囊都以与晋缔结盟约不久而反对进兵，但司马子反力主进兵，他说：“敌利则进，何盟之有？”楚共王采纳了子反的建议，起兵讨伐郑、卫等国。第一次弭兵之约就此破裂。^④

这一事件体现出，纯粹从理性的角度看，在当时给定其他大国不采用武

① 《左传·鲁襄公八年》；《左传·鲁襄公九年》。

② 《左传·鲁襄公九年》。

③ 《左传·鲁成公十二年》。

④ 《左传·鲁成公十五年》。

□ 当代亚太

力进行权力竞争的情况下，某个大国选择背叛弭兵之约对自己更为有利。这意味着武力胁迫战略已经有了显著的收益，晋楚两国互不采用武力进行权力竞争的状态，已经不是各自最优的状态。换言之，晋楚弭兵不是一种纳什均衡状态，这种状态很容易打破。公元前 546 年，晋、楚两国因内争外患，再次缔结弭兵之约。40 年之后的公元前 506 年，晋国召开召陵之会商议讨伐楚国，第二次弭兵之约又告结束。^①

（四）后晋楚争霸时期

随着晋楚争霸时期大国对小国争夺方式的逐渐演化，到了后晋楚争霸时期，武力胁迫战略的优势已经彻底显现出来，成为了大国争霸的主导性战略。在此之前，武力胁迫主要针对小国，目的主要是迫使小国在政治上臣服于自己；而到了后晋楚争霸时期，武力胁迫战略的对象已经扩大到其他的大国，而且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获得他国的臣服，而是已经发展为以彻底歼灭其他国家为核心目的。

公元前 506 年，蔡国侵犯楚国的属国沈国，楚国为救沈国而围困蔡国。吴国乘机联合蔡国和唐国攻打楚国，在柏举会战中楚军大败，吴军穷追不舍，一直攻入并占领楚国都城郢，楚昭王辗转逃奔至随国。如果不是楚大夫申包胥向秦国求援，秦哀公被其爱国之心感动，同时越国乘机入侵吴国，曾经雄视天下的南方超级大国楚国就很有可能成为春秋历史上第一个因他国的征伐而覆灭的大国。^② 公元前 494 年，吴王夫差率军攻打越国，在夫椒大败越军，越王勾践被迫带领五千名士兵退守于会稽山，同时向吴国求和。如果吴王听从伍子胥的劝谏不予讲和，那么曾经大败吴军并对吴国构成强烈战略牵制的东南大国越国在当时就被灭国了。^③ 在此后吴、越两国的竞争中，越国终于从楚国和自己险些灭国的经验中“学习”到了适合于当时国际形势的最佳战略，通过狡诈、欺骗和残酷的暴力方式，于公元前 473 年彻底消灭吴国。^④ 吴国也因此成为东周历史上第一个灭亡的大国，而越国则成为东周历史上第一个通过彻底歼灭另一个大国而获得霸权的国家。

① 童书业：《春秋史》，第 194 页。

② 《左传·鲁定公四年》。

③ 《左传·鲁哀公元年》。

④ 《左传·鲁哀公二十二年》。

五、二战后体系的关键案例及比较

第四部分以春秋体系的进程为案例，展示了在成本较低的情况下武力胁迫逐渐取代利益交换成为演化稳定战略的过程。作为对照，我们需要考察二战后体系的进程，观察在这一体系中武力胁迫的成本对大国权力竞争战略演化的影响。限于篇幅，同时考虑到读者普遍对二战后的历史较为熟悉，这里不再完整地回顾二战后的体系进程，转而考察二战后大国争夺小国的一个关键性案例——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此与春秋时期两极结构下晋、楚两国争夺小国的行为和结果进行对比，以展示核武器的存在所造成的武力胁迫成本的急剧升高对大国权力竞争过程的影响，然后从权力竞争的维度对两个体系的异同做出宏观比较。

（一）核威慑下的大国权力竞争：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

1959年卡斯特罗推翻巴蒂斯塔政权上台后，美国认定古巴受共产党的支持和影响，于1960年10月开始大规模禁止对古巴出口，同时中情局开始在危地马拉训练古巴流亡者。随后美国又断绝了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并于1961年4月策划发动了“猪湾行动”，利用流亡在美国的古巴反对派向卡斯特罗政权发动武装进攻。^①面对美国的武力胁迫，卡斯特罗政权很自然地寻求苏联阵营的援助。1960年2月，米高扬访问古巴，苏古随即签订了贸易协定。同年3月，苏联同意为古巴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但苏联也曾一度担心为保护卡斯特罗政权而承担过大的财政负担，因而当1960年秋古巴提出希望成为“经互会”的“永久观察员”时，苏联出现了犹豫。这引起了卡斯特罗的不满，到1962年3月，卡斯特罗甚至在其领导层中清洗了老共产党的主要成员，还强调古巴共产主义必须以卡斯特罗自己的思想为中心。^②

苏联意识到，如果不能很好地满足古巴寻求安全保障的需要，自己将很有可能失去在古巴的影响力。出于保护古巴的目的，赫鲁晓夫于1962年5

① 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174页。

② 同上，第174~176页。

□ 当代亚太

月做出了在古巴秘密部署核导弹的决定。^① 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如果秘密部署导弹，并且直到这些导弹已经部署并做好打击准备后美国才发现，那么美国人在试图通过军事手段清除我们的部署前就要三思。……只要四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导弹能够存活下来——甚至即使只有一两个大的导弹留下来——我们就仍然能够打到纽约，那样的话纽约将所剩无几。……关键的问题是，我认为，古巴的导弹部署会阻止美国对卡斯特罗政府采取鲁莽举动。”^②

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行为在 1962 年 10 月 14 日被美国 U-2 飞机拍到。10 月 16 日，肯尼迪总统收到了 U-2 飞机拍摄到的第一批照片。^③ 古巴导弹问题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战略决策构成了巨大的压力。肯尼迪将苏联的这一举动与当时的柏林问题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如果美国未能将苏联的导弹从古巴撤出，世界将会怀疑美国保护柏林的意愿。而如果美国封锁了古巴，苏联则可能封锁柏林作为报复。如果美国发动空袭或者入侵古巴，苏联就有可能占领柏林。^④

10 月 16 日上午 11 时 50 分，肯尼迪政府执行委员会开始讨论如何应对赫鲁晓夫在古巴的行动。讨论的主要应对方案有两种：一是空袭古巴摧毁导弹，并继之以可能的全面入侵；二是封锁古巴，并视事态发展再决定下一步的举措。在肯尼迪于 10 月 22 日晚间就古巴导弹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之前，执委会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见是空袭和轰炸，空军参谋长柯蒂斯·莱梅（Curtis E. LeMay）甚至批评封锁方案“几乎与在慕尼黑的绥靖一样糟糕”。尽管如此，肯尼迪最终还是选择了相对谨慎的封锁建议，并在正式语言表述上选择了相对更加中性的“隔离”（quarantine）一词。^⑤

10 月 22 日莫斯科时间晚 7 点，苏联得知肯尼迪即将于当天发表电视讲

① Nikita S.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trobe Talbott, Boston: Little, Brown, 1970, p. 494.

② William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3, p. 535.

③ 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第 10 版）》，牛可、翟韬、张静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年版，第 181 页；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册）》，王琛等译，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60~361 页。

④ William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pp. 530-531.

⑤ Ibid., pp. 559-560.

话。晚 10 点，苏联主席团连夜召开会议商讨对策，最终决定驻古巴苏军可以使用各种武器和导弹，但只能装载常规弹头。^① 这是古巴导弹危机发生以来苏联第一次主动做出的避免冲突升级的克制举动。而美国方面，肯尼迪在 22 日发布的电视讲话中表示，美国将会实施对古巴的全面封锁以阻止进攻性的军事装备被进一步运往古巴。如果苏联舰船强行前进，并且导弹并未移除的话，美国将阻止它们前进。肯尼迪说：“我已经命令军队为任何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②

10 月 23 日 16 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发表了苏联政府关于肯尼迪电视讲话的声明，宣布了军事上的应对措施，包括取消军人休假和退伍安排，并提高了全部武装力量的战备等级。^③ 但就在同一天召开的主席团会议上，苏联最高领导层最终决定，所有已经到达大西洋的船只不再继续靠近古巴，在地中海航行的船只立即返回黑海港口，而用于护航的潜艇则停留在离古巴有两天航程的海域。^④ 10 月 24 日上午 10 点，美国对古巴的隔离政策正式生效，战备状态仅次于全面战争。^⑤ 当天，苏联军舰在接近美国封锁线并且已经面对美国战舰时，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停止前进并后退。苏联以这种方式向美国释放出信号，即苏联不愿为保护古巴而与美国发生正面冲撞。^⑥

为进一步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战争，10 月 25 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第一次谈到了从古巴撤出导弹的可能性。条件是美国承诺自身及其盟友不侵犯古巴。与此同时，为了维护苏联的战略信誉，赫鲁晓夫还考虑在给肯尼迪的信中附加另一个条件，即美国从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基地撤出木星导弹。^⑦ 但到了 26 日上午，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出

① Aleksandr A.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Khrushchev's Cold War: The Inside Story of an American Adversa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6, p. 473.

② 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孙冈欣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33 页。

③ William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pp. 562-563.

④ Aleksandr A. Fursenko and Timothy Naftali, *Khrushchev's Cold War*, pp. 476-480.

⑤ William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p. 565.

⑥ Oleg Troyanovsky, "The 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William Taubman, Sergei Khrushchev, and Abbott Gleason, eds., *Nikita Khrushchev*, trans. by David Gehrenbeck, Eileen Kane, and Alla Bashenko,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37.

⑦ Sergei Khrushchev, *Nikita Khrushchev and the Creation of a Superpower*, trans. by Shirley Benso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580-581.

□ 当代亚太

于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的考虑，再一次做出让步，表示只要“美国保证不攻击古巴，那么我们尽管不愉快，也将从古巴撤离导弹，否则形势将变得更加危险。”^①

10月26日，赫鲁晓夫在给肯尼迪的信中提出了解决这次危机的建议：“就苏联方面而言，我们将宣布，苏联所有驶向古巴的船舶将不会搭载任何类型的军备。而你们则应宣布，美国将不会武力入侵古巴，并且不再支持任何有可能试图入侵古巴的军事力量。这样的话，苏联也就没有必要在古巴保留军事人员了。”^②与此同时，他还在信中反复强调战争对美苏双方带来的可怕后果：“你很清楚，（如果美国对苏联发动战争）作为回应，美国将遭受至少与美国对苏联所施加的打击相同的后果，”“我们绝不能被自我陶醉和琐碎的激情所挟持”，“只有疯子和那些想自杀的人”才会发动战争。^③

出于对自身战略信誉和国家利益的考虑，在10月27日给肯尼迪发去的第二封信中，赫鲁晓夫重新加上了两天前希望美国从欧洲撤出导弹的条件。他说：“你说古巴的事困扰着你，因为它与美国海岸仅相距90英里。可是土耳其就与我们接壤，两国的哨兵来回巡逻时都能互相看见对方。你难道能够认为，你有权利出于贵国安全而提出要求，有权利移除这些你认为的进攻性武器，却不能给予我们相同的权利吗？”他提议，美苏双方分别从土耳其和古巴撤出导弹，并在安理会的框架内分别做出不入侵古巴和土耳其的保证。^④

就如何应对赫鲁晓夫第二封信所提出的新的条件，肯尼迪及其军事顾问和助手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副国务卿乔治·鲍尔（George W. Ball）指出，如果接受赫鲁晓夫的要求从土耳其撤出导弹，将不可避免地破坏美国的战略信誉。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也提醒

^① Sergei Khrushchev, *Nikita Khrushchev and the Creation of a Superpower*, trans. by Shirley Benso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84.

^②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6, 196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Kennedy-Khrushchev Exchanges*, Vol. VI, pp. 176-177.

^③ Ibid., pp. 173-174.

^④ “Letter From Chairman Khrushchev to President Kennedy”, October 27, 1962,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Kennedy-Khrushchev Exchanges*, Vol. VI, pp. 179-180.

说：“如果我们因此而与土耳其交涉，那么这就已经说明我们正在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卖盟友。北约的所有成员都会这么认为。”^① 再加上当天美国的一架 U-2 侦察飞机在古巴被击落，肯尼迪的军事顾问和助手们都普遍主张对古巴进行更大规模的空袭，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已经准备在必要时发起一场全面核战争。^②

但是，肯尼迪始终坚持倾向于接受苏联开出的这个新条件。他一方面强调，在讨论任何事情之前，古巴境内的导弹建设必须首先停止。但他也同时强调：“我们应当和土耳其人商量此事，因为我想他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下星期我们在古巴采取行动，他们将会被带进非常危险的境地。我想他（即赫鲁晓夫）很有可能对土耳其采取行动。土耳其人应当意识到这个问题。”^③

最终，肯尼迪决定，在给赫鲁晓夫的回信中不涉及其第二封信所提的要求，只是表示，如果苏联从古巴移除其部署的武器系统，并同意接受联合国视察，美国将会终止对古巴的封锁措施，并且承诺不会入侵古巴。^④ 与此同时，他让其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在当天晚上以非官方的形式约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在会见中，罗伯特·肯尼迪表示，考虑到美国在北约盟友中的威望和义务，总统无法单边宣布将导弹撤出土耳其，但是在这次危机结束后不久，这些导弹将会被移除，不过这一点不能作为书面的交换条件。^⑤

在收到肯尼迪 27 日的回信后，苏联最高主席团于 10 月 28 日上午再次召开会议。在分析了苏联情报人员返回的相关情报后，赫鲁晓夫认为，肯尼迪授权其弟弟与多勃雷宁进行私下会谈并暗示美国可以变相接受苏联提出的从土耳其撤出导弹这些举动，很可能并没有通报其决策圈。这说明美国决策层对肯尼迪施加的战争压力已经非常大，以至于后者已经无法冒决策失控的

① Sheldon M. Stern,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Inside the Secret Cuban Missile Crisi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51.

② 梅尔文·P·莱弗勒：《人心之争》，第 137 页。

③ Sergei Khrushchev, *Nikita Khrushchev and the Creation of a Superpower*, pp. 618-620; Sheldon M. Stern,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p. 153.

④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October 27, 1962, i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Kennedy-Khrushchev Exchanges*, Vol. VI, pp. 181-182.

⑤ Sheldon M. Stern, *The Week the World Stood Still*, p. 188.

□ 当代亚太

风险而将这个与敌人妥协的信号传递给其同僚，这意味着美国已经到了战争的临界点。^① 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因此认为，如果不想和美国发生核战争，那么只能接受美国的提议。现在我们面临着战争的危險与核灾难。……为了拯救整个世界，我们必须做出让步。”^② 10月28日，赫鲁晓夫在发给肯尼迪的公开信中表示苏联政府已经“下达了新的命令，拆除你们所认为的进攻性武器，将其装箱运回苏联”。^③ 肯尼迪很快做出回复，对赫鲁晓夫的决定表示欢迎。^④

在这场危机中，美苏双方都做出了克制和退让。苏联固然选择了停止军舰前进并后退，并最终同意从古巴撤出导弹，而美国在危机过程中同样表现出了规避战争的极大意愿。如果同意苏联的提议用土耳其的导弹做交易，就会向全世界释放信号显示美国在苏联压力面前退缩了。^⑤ 然而即便面对如此大的压力，肯尼迪依然认为，如果能够换取苏联拆除在古巴的导弹并且避免核战争，付出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⑥ 事实上，就在10月27日晚上肯尼迪派其弟弟去秘密约见多勃雷宁之后，肯尼迪又立即与国务卿腊斯克（David D. Rusk）商议并决定，准备一封提交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的信，在信中提议美苏两国分别撤走各自在土耳其和古巴的导弹。^⑦

如前所述，古巴导弹危机的根本起因在于美苏两国对古巴这个小国的争夺，美国试图通过对古巴实施武力胁迫使其放弃共产主义路线，而苏联则试图通过为其提供安全保障而保持对其的影响力，从而争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赢得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尊重。^⑧ 古巴导弹危机的过程和结果则说明，当美苏两个大国有可能因争夺某个小国而发生直接战争时，避免战争是两国

① Sergei Khrushchev, *Nikita Khrushchev and the Creation of a Superpower*, pp. 621-623.

② Ibid., p. 623.

③ “Letter From Chairman Khrushchev to President Kennedy”, October 28, 1962, i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Kennedy-Khrushchev Exchanges*, Vol. VI, p. 183.

④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Soviet Union”, October 28, 1962, i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1-1963; Kennedy-Khrushchev Exchanges*, Vol. VI, p. 187.

⑤ 理查德·克罗卡特：《50年战争》，王振西主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

⑥ 沃尔特·拉费伯尔：《美国、俄国和冷战》，第153页。

⑦ Anatoly Dobrynin, *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1962-1986)*, New York: Times Books, 1995, pp. 93-94.

⑧ 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册）》，第344页。

的首要利益。而之所以规避战争的需求超过了权力争夺的需求，根本上是由于双方都在“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胁下。^①

正如一位前苏联大使在回顾这场危机的影响时所指出的那样：“重要的是，当车轮开始转动而空气中开始弥漫火药味时，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展示出了智慧、克制和真正的政治才能。他们都没有试图将对手逼向墙角，而是给对手留出余地，让其有可能从困难局势中脱身……对于美苏双方以及各自的领导者们来说，1962年10月所发生的事情具有极其重大的教育意义。它使得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核毁灭是有可能的，因此外交冒险政策应当被排除在大国决策选项的范围之外，与此同时，超级大国间应当建立和追求更安全、更具建设性的关系。”^②事实上，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前，美苏之间还动辄以“动用核武器”威胁对方，但在此之后，美苏两国就再也没有为取得政治、外交利益而向对方发出过核威胁。^③即使是在坚持进攻性战略的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其进攻性战略在政治领域的核心手段也是缓和，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和冲突不应通过战争、不应通过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来解决”。^④

（二）春秋体系和二战后体系的比较

第一，春秋体系和二战后体系最重要的相似之处在于，这两个体系中的大国都曾以利益交换作为其权力竞争的主要战略，即都曾主动为小国提供过诸如安全保障这样的好处，并都曾以此实现了增加或保持自身权势的目的。在各个方面差异都非常大的情况下，两个体系中的大国的行为居然会出现如此明显的相似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两个体系初期都存在保护小国决策自由不受大国侵犯的主流规范，并且这种规范为当时主要大国所认可。春秋初期是周朝礼制，而二战后初期则是主权规范。当小国能够保持决策自由时，利益交换战略作为权力竞争的一种占优战略，其优势就会体现出来，无论是春秋初期还是二战后初期的大国都会倾向于选择利益交换战略。

不过，这两个体系中的大国在实施利益交换战略时所使用的具体战术手段存在着明显差异。在春秋体系中，利益交换战略的实现，无论是通过尊王

① 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册）》，第368页。

② Oleg Troyanovsky, “The Making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p. 238.

③ 朱锋：《冷战中的美苏军备控制与裁军》，载牛军主编：《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页。

④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第四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204页。

□ 当代亚太

还是攘夷，还是为某个体系内小国提供安全保障，最终都需要通过武力和战争的方式加以实现。换言之，武力胁迫战略内嵌于利益交换战略之中。这导致了如下情况：如果利益交换战略失败，就会鼓励武力胁迫战略；而如果利益交换战略成功，则由于其成功的直接原因是通过武力迫使某一方放弃挑战和进攻，因此客观上也会起到鼓励武力胁迫战略的效果。而在二战后体系中，美苏两国对各自盟友提供的安全保障主要都是通过核威慑和延伸威慑的方式，并不诉诸于战争。核威慑的可靠性保证了二战后利益交换战略对小国的吸引力，这有助于抑制武力胁迫战略的采用和扩散。

第二，春秋体系和二战后体系最明显的区别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春秋体系中大国权力竞争越来越伴随着大国间战争，并且战争规模越来越大，而二战后体系则始终没有爆发大国间战争。导致这种区别产生的最直接原因是，春秋时期，当保护小国和避免与其他大国发生战争这两者发生矛盾时，当时的大国往往会选择保护小国而不惜与其他大国开战；而在二战后，当这两者发生矛盾时，大国则宁可牺牲保护小国的战略信誉，也会选择避免与其他大国发生战争。这显然不是因为春秋时期的大国对权力的追求比二战后的大国更强烈，而是直接受大国间战争成本的约束，即核武器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决策者对战争成本的考量。

不妨以城濮之战和古巴导弹危机做比较。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第一次大国间战争，起因是宋国背叛楚国投靠晋国，楚国出兵攻打宋国，晋国则出兵保护宋国。古巴导弹危机则是二战后除第二次柏林危机外美苏两国间的一次严重军事危机，起因是美国武力胁迫一个小国，而苏联则试图为该小国提供安全保障。这两个案例中，发生冲突的大国都面临着是否选择与另一个大国发生战争的决策问题，其决策者都曾一度犹豫是否要冒险一战。然而，当晋文公犹豫不决之际，大臣狐偃劝他说：“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①结果晋文公决意与楚国一战。而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肯尼迪，都对美苏核战争的后果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审慎和恐惧，因而最终不惜损害各自在盟友中的战略信誉而与对方达成妥协。正是大国间战争成本的巨大差异，根本上决定了两个体系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走向。城濮之战之后，大国间战争变得日益普遍；而古巴导弹危机

^① 《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

之后，超级大国间再也没有发生过直接的有战争风险的军事危机。

六、结 论

（一）理论总结

本文研究了两个相关联的问题：第一，同样处于无政府状态，为什么在春秋初期和二战后初期的国际体系都出现了明显的大国主动利他的行为？第二，为什么二战后初期出现的利他行为得以延续并被逐渐巩固，而春秋初期出现的利他行为却未能延续，反而逐渐退化为一个彻底的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本文的理论模型显示，在特定条件下，即使处于无政府状态，追求权力的大国也会主动采取具有利他效应的利益交换战略。导致这种权力竞争方式出现的最关键的条件是体系中存在抑制大国剥夺小国自主性的社会规范。不过，受具体体系环境的约束，即使当所有条件都满足并且使得利益交换战略成为大国权力竞争的占优战略时，也并不意味着这种良性的权力竞争局面一定能够持续下去。当大国对小国施加武力胁迫的成本越大，而武力胁迫战略给竞争对手带来的收益越小时，以利益交换为主流权力竞争战略的良性模式得以保持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博弈的均衡状态则有可能发生转移，由原来的（利益交换，利益交换）演变为（武力胁迫，武力胁迫）。本文对春秋体系和二战后体系进程的追踪和比较印证了上述理论判断。

（二）理论意义

首先，重新理解无政府状态与自助的关系。在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的研究纲领中，无政府状态自动意味着一种“自助状态”，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的任何“非自助”行为都是不可想象的或者是自取灭亡的。而在温特的研究纲领中，虽然取消了无政府状态自动导致自助的逻辑关系，但它只相信，改变国家自助行为模式的途径只能依靠观念建构和文化转变。然而，本文的研究则显示，无政府状态——无论其属于温特所界定的哪一种文化——并非自助的充分条件。华尔兹说：“在自助系统中，那些不实行自助或者自助的效率不及他国的国家，将难以实现繁荣，并将面临危险和苦难。”^①但事实上，在主权规范和相互确保核威慑这两个参数不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利益交换这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18.

种“非自助”式战略反而是当今国际体系中大国权力互动的演化稳定战略，它规定了我们所处的时代大国权力竞争的基本游戏规则。

其次，正视国际体系的演化以及权力动机对演化的重要推动作用。受社会学、生物学乃至演化经济学等学科的影响，并出于对华尔兹范式的反动，自温特以降，国际关系学者开始逐渐注意和重视国际体系的变化和演化。^① 本文的研究印证了演化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重要性。即使在无政府状态这一点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国际政治也绝非一成不变，大国权力竞争方式会以何种形式维持，具有历史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而要真正理解国际体系的这一重要方面，我们需要引入演化主义的视角和工具。然而，现有的具有“演化主义”色彩的理论对华尔兹范式的超越并不彻底，大都接受华尔兹范式对国家行为动机的假定，即安全追求是第一推动。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国家有关权力、地位等精神性利益诉求的重要性。^② 本文的研究进一步印证了，权力动机可能是至少与安全动机同样重要的国际政治的演化动力。

^① 近年来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参见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现实主义阵营的学者也开始认同并强调国际政治的“时间维度”，呼吁重视国际关系的演化，参见 Randall L. Schweller, “Rational Theory for a Bygone Era”, pp. 460-468; 陈小鼎、刘丰：《肯尼思·华尔兹的理论品性及其启示——反思当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54、58页。

^② Thomas J. Volgy and Stacey Mayhall, “Status Inconsistency and International War: Exploring the Effects of Systemic Chang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9, No. 1, 1995, pp. 67-84; Randall L. Schweller, “Realism and the Present Great Power System: Growth and Positional Conflict Over Scarce Resource”, in Ethan B.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8-68; Bradley A. Thayer, “Bringing in Darwin: Evolutionary Theo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24-125; Richard Ned Lebow, *A Cultur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ichard Ned Lebow, *Why Nations Fight*; Jonathan Kirshner, “The Tragedy of Offensive Realism”, pp. 53-75;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s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 to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4, 2010, pp. 63-95; Thomas J. Volgy, et al., eds., *Major Powers and the Quest for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Glob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T. V. Paul, et al.,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